漢碑圖畫出文章—
從濟寧州學的漢碑談十八世紀後期的訪碑活動

盧慧紋*

【摘要】「訪碑」—探訪保存於各地文廟、祠堂或矗立在野外的古碑—是清代金石學家最重要的活動之一，他們強調走出書齋實地探查散存各地的碑碣，來釐清因拓手疏忽遺漏、拓工不佳或拓本殘缺所造成的版本混亂問題。有清一代訪碑成果豐碩，影響深遠，十八世紀後期的發現與各種研究著述尤為重要。然關於清代訪碑的活動內容、重要性，乃至其文化意義，目前學界尚未有全面的認識。本文聚焦十八世紀後半訪碑活動最活躍的地點之一—山東濟寧州學，檢視其所藏漢碑，包括〈景君碑〉、〈鄭固碑〉、〈魯峻碑〉、〈鄭季宣碑〉、〈武榮碑〉、〈范式碑〉及其他殘石，在超過一世紀（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後期）的時間中，被反覆取拓、升起重立或發現移入的歷史，尤其聚焦十八世紀後期黃易與翁方綱等人在此地的活動，以及他們對相關活動所作的考釋、詩文題跋與圖繪，最後討論訪碑活動如何造成漢隸研究的改變，且影響及碑學書法的盛行。本文期望釐清「訪碑」這個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一，並且希冀對了解碑學書法的興起與發展有所貢獻。

關鍵詞：訪碑、濟寧州學、漢碑、黃易、翁方綱

前言

訪碑—探訪保存於各地文廟、祠堂或散立在野外、鐫刻於山壁的古碑刻—是清代金石學家最重要的活動之一，他們強調走出書齋實地考查散存各地的碑碣，來釐清因拓手疏忽遺漏、拓工不佳或拓本殘缺所造成的版本混亂問題。①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① 這是清代和宋代金石研究者的一項重要區隔特徵。宋代金石學家主要以傳世或於古玩市場新購得的拓本為對象，進行古字體發展、書法風格演進，和「以碑證史」等金石相關研究。宋代學者如歐陽修與趙明誠在赴任官職的旅途中亦偶爾有小規模的訪碑活動，不過他們的訪碑不論在規模或次數方面，都無法與清人相提並論。白謙慎在探討明末清初的訪碑活動時，簡要地回顧了北宋的情形，見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178-179.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訪碑風潮起於明末清初，至乾隆後期，即十八世紀後半，達到一個高峰，各地學者積極訪查的結果不僅廓清許多著錄及傳世拓本的錯亂、重新發現佚失多時的遺跡，其搜羅、著錄、校定及複製古碑的成果豐碩，關鍵性地形塑了後人對這些古代遺蹟的認識。訪碑獲得之新材料影響所及，使得篆隸書體及碑學書法在清中後期大盛，造成中國書法史，連帶及繪畫史的面貌徹底改換。② 訪碑活動亦滲透古物收藏、藝術理論闡發、朋友交誼等各層面，成為十八世紀文人文化的一個重要面象。目前學界對訪碑相關活動與論述尚未有全面的認識，本文聚焦十八世紀後半訪碑最活躍的地點之一──山東濟寧州學，檢視其所藏漢碑，包括〈北海相景君碑〉、〈郎中鄭固碑〉、〈司隸校尉魯峻碑〉、〈尉氏令鄭季宣碑〉、〈執金吾丞武榮碑〉、〈廬江太守范式碑〉及其他殘石，③ 在超過一世紀（十七至十八世紀後期）的時間中，被反覆取拓、升起重立或發現移入的歷史，並討論相關考釋、詩文題跋及圖繪，試圖為清代訪碑活動由興起至鼎盛的具體發展及影響提供一案例研究。

在進入細節討論前，有必要在此對本文的立題與背景作一交代。明末清初的訪碑有多種動機，或源自明遺民的傷逝情懷，或出於考據訓詁的需要，或為保存地方史料，或志在追求古漢隸典範，然因多為零星的個人活動，不足以形成一種普遍的文化氛圍。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除因歷史情境轉換而使遺民情懷不再，前述各種訪碑脈絡在儒家「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④ 興盛的十八世紀後半擴張成長並趨於成熟，進而彼此重疊，交織成一巨大的網絡，籠

② 這一現象可比擬古希臘羅馬的遺蹟、古物（antiquity）對後世藝術創作的影響，尤其是熱衷發掘古遺蹟的文藝復興時期與十八世紀。關於中國與歐洲的比較研究，可參見Lothar Ledderose, "Aesthetic Appropriation of Ancient Calligraphy in Modern China," in Maxwell K. Hearn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inese Art: Modern Expression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1), pp. 212-245.

③ 這些碑石現藏濟寧市博物館漢碑室。參見宮興衍，《濟寧全漢碑》（濟南：齊魯書社，1990）；何平，《中國碑林紀行》（東京：二玄社，1999），頁104-108。

④ 參見余英時對明清思想史中儒家「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興起的討論。余英時，〈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1996），頁19-36。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罩各階層文人。⑤ 漢碑為十八世紀訪碑的主要對象，對碑版考釋及書學研究的影響也最大。相較於漢碑最大的集中地－曲阜孔廟，濟寧州學的漢碑數量較少且保存情況差，但正由於這個原因，在訪碑風潮興起後特別可以看到地方士人與各地學者積極將它們復原整理的努力。

在濟寧州學漢碑的發現歷史中，金石學者、書畫家黃易（1744－1802）在此地的活動最為重要。黃易於1780年代至1790年代，結合當地原有的探碑人士（李東琪）及其他金石學者（翁方綱），形成一個以搜尋及研究古碑刻為主要目的的綿密人際網。經過他們的努力，濟寧州學的漢碑數量在十八世紀末倍增前代，並透過拓本、考釋、題跋及圖繪等途徑傳播而廣為人知。黃易堪稱十八世紀的訪碑代表人物，他在濟寧的訪碑故事並非僅是小地域間，少數學者的活動，其不論就黃易個人一生的訪碑旅程，或清代整體的訪碑風潮而言，都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亦能清楚揭示十八世紀訪碑的發展情形與相關問題。

本文第一節為「前人研究」，檢視目前學界有關清代訪碑活動的研究情形。第二節「清初的訪碑活動與濟寧州學的漢碑」回顧十七世紀金石學者對濟寧漢碑的探訪與整理，以為十八世紀的情形提供發展脈絡與比較對象。第三節「十八世紀濟寧當地士人的探碑」廓清雍正、乾隆年間濟寧士人如李鶚與李東琪父子如何發掘與維護當地古碑，這些人與事對後來黃易的訪碑工作有極大的幫助。第四節「黃易到任與州學古碑的整理與擴充」討論黃易自1777年到任濟寧後，二十餘年間探訪濟寧及鄰近地區東漢碑刻的情形。第五節「考釋、詩文題跋與圖繪」檢視翁方綱與黃易的相關圖文作品，探討訪碑活動與成果如何被論述與呈現。第六節「訪碑活動影響下的漢隸研究」檢視訪碑活動對石刻著錄與字書造成的轉變。本文期望釐清「訪碑」這個十八世紀最重要的文化現象之

⑤ 從經學大師到書畫家，上至一省巡撫下至學校生員，規模小至單獨行動大至全省有組織、有系統的調查徵集，此時期訪碑活動蔚然成風，多種模式共存並經常相互合作啟發。另一方面，訪碑亦與士大夫旅遊風氣結合。學者在考察清中葉士大夫的旅遊時，即注意到雖然在明人的遊記中已可見懷古與好古的風氣，但此時的士大夫更進一步地、具體地將訪古視為旅遊活動中的要務。他們的遊記中充滿了對古蹟、古物、古碑等的詳細考證，這種知識性的「考古」風潮在清中葉成為一種流行的旅遊論述形式。參見巫仁恕，〈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頁271-275。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一，並且希冀對了解碑學書法的興起與發展有所貢獻。

一、前人研究

對古代碑刻的搜訪、摹拓、鑒藏和研究是清代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基礎，在通論性的清代書法史著作及書家專論中，學者對相關的人物、活動與著述皆有涉及，然僅止於廣泛的綜論。⑥ 近來學界漸關注十八世紀的訪碑活動，尤其聚焦黃易的活動及其圖文記錄，⑦ 除對各種資料進行彙整，並有學者由文化或政治的角度來剖析。曾藍瑩（Lillian Lan-ying Tseng）於2003年發表“Retrieving the Past, Inventing the Memorable: Huang Yi's Visit to the Song-Luo Monuments”一文，透過解讀黃易的〈嵩洛訪碑日記〉、〈嵩洛訪碑圖冊〉與相關題跋、後世摹本等由訪碑活動所衍生出的文化產品，探討這些圖、文如何建構個人回憶以及友人間的共同記憶，還有在圖像複製過程中，紀念物（monuments）與記憶（memories）之間的可替換的不穩定關係。⑧ 梅韻秋（Yun-chiu Mei） 完

⑥ 例如劉恆的《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在明末、清初、中、晚期的論述中都有篇幅描述金石碑版的搜訪與相關活動。劉恆，《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67-69、76-78、152-156、160-164、222-235。薛龍春在關於清初隸書家鄭簠的研究中，專闢一章討論鄭簠與明末清初的訪碑活動，見薛龍春，《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

⑦ 黃易最為人所知的訪碑活動是於嘉祥紫雲山下發現東漢「武氏祠堂群」，關於發現過程、後續的募款與重建工作，還有黃易的圖繪記錄，參見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70; Cary Liu et al.,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另外，關於黃易的訪碑圖，可參見蔡鴻茹，〈黃易《得碑十二圖》〉，《文物》，1996年3期，頁72-79；張淑蘭，〈清黃易得碑圖冊〉，《收藏家》，1996年3期（總第17期），頁15-17。

⑧ Lillian Lan-ying Tseng, "Retrieving the Past, Inventing the Memorable: Huang Yi's Visit to the Song-Luo Monuments," in Robert S. Nelson and Margaret Olin eds., *Monuments and Memory, Made and Unmad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37-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於2008年的博士論文“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則由文化角力的角度切入，主張十八世紀時黃易等漢族文人積極搜訪與保存古碑，可能是為了與康熙、乾隆皇帝在全國各地廣立御書碑相抗衡。⑨

這些論著都增進了我們對十八世紀訪碑及相關議題的認識，然而十八世紀的訪碑有其內在歷史脈絡，當我們關注其衍生之文化產品及外在因素時，不應忽略訪碑目的所在之拓片版本比較、文字校對或書法研究。本文聚焦濟寧州學一地所藏漢碑，試圖較細緻地追究黃易等人的訪碑人際網絡運作。此外，透過考察參與者的碑學著作，筆者期望突顯訪碑在碑學脈絡中的意義。

二、十七世紀後半的訪碑活動與濟寧州學的漢碑

學者Qianshen Bai（白謙慎）在研究明末清初書法家傅山（1607－1684/5）的專著中，首先提出清初的明遺民特別熱衷訪碑活動，並以傅山為中心，檢視了訪碑及古碑研究在遺民圈中所具有的特殊意義。碑，尤其是斷碑，陳於荒煙漫草中的景像隱寓朝代更替；而訪碑、讀碑、撫碑等行為，則在傷逝感懷的遺民文化中被賦予儀式性的意涵。傅山、顧炎武（1613－1682）、屈大均（1630－1696）等明遺民不僅跋山涉水親訪古蹟、古碑，並在詩文中明白吐露與此活動緊緊相繫的歷史緬懷。⑩ 此時期的訪碑活動除了具有傷逝的情懷，亦與考證訓詁有關。顧炎武提倡訓詁治經，即由識字審音入手，通過古字、古音的考據訓詁，對儒家經典進行準確詮釋，而這類考訂工作經常倚賴古金石文字進行。⑪ 除此之外，書法家與拓片商賈積極訪求古代碑石以為書法典範，使得清初出

⑨ 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08).

⑩ 見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pp. 172-177.

⑪ 此「考文」、「知音」、「信古」、「求是」的治經方法以漢儒為宗主，因此又稱「漢學」，嘉慶年間江藩有《漢學師承記》一書述清初以來的這支經學淵源。這種治經方法在康熙朝漸成學界共識，而後於乾隆、嘉慶，迄于道光年間，經戴震、畢沅、錢大昕、王念孫與王引之父子，及阮元等人繼承發揚，蔚為風潮。此經史考證之學又被稱作「樸學」、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現一波訪碑風潮，其中參與者的熱切程度、旅行範圍及在過程中願意承受的磨難都遠超過前代。⑫

山東濟寧是清初訪碑者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濟寧位於山東省西南部，古名任城，隋、唐、五代置任城縣，元初改稱濟寧，又稱濟州，清時則為濟寧直隸州。元世祖至元年間（1260－1294）始於當地建孔廟，與原有的學宮結合，自此成為定制。⑬

史上關於濟寧（任城）學宮立有漢碑的最早記載見於十二世紀趙明誠的《金石錄》。《金石錄》卷十六〈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條下說道：「……此碑為人輦至任城縣學矣」，⑭ 惜未載確切搬移時間。此後數百年相關記載極稀，但至遲在十七世紀後半，濟寧州學（亦為孔廟）的儀門（又稱戟門、大成門，位於大成殿之前）內已立有五通東漢碑，依時代先後分別是：

1.〈北海相景君碑〉（143年）（以下簡稱〈景君碑〉；圖1）
2.〈郎中鄭固碑〉（158年）（以下簡稱〈鄭固碑〉；圖2）
3.〈執金吾丞武榮碑〉（167年）（以下簡稱〈武榮碑〉；圖3）
4.〈司隸校尉魯峻碑〉（173年）（以下簡稱〈魯峻碑〉；圖4）
5.〈尉氏令鄭季宣碑〉（186年）（以下簡稱〈鄭季宣碑〉；圖5）

「考據學」，在學術史上有乾嘉學派之稱。參考陳祖武、朱彤窗，《乾嘉學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1).

⑫ 關於宋代與明末清初的訪碑，白謙慎有扼要討論，見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pp. 178-181. 關於明末清初的情況，薛龍春在論清初書家鄭簠（1622-1693）的專書中有較詳細的討論，見薛龍春，《鄭簠研究》，第二章〈鄭簠與明末清初的訪碑活動〉，頁27-58。

⑬ 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完成於1841），卷五之一，收入《新修方志叢刊》第83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第三冊，頁894-913。

⑭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卷十六（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頁29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五通漢碑原散立於任城及鄰近金鄉地區，雖廣為金石學家著錄，然著錄內容多傳抄沿襲舊說，碑石現況與被移入濟寧州學的時間皆不明。⑮ 各碑書法面貌不同，〈景君碑〉瘦勁並帶篆意，〈鄭固碑〉流麗舒展，〈武榮碑〉圓結整飭，〈魯峻碑〉豐腴雄偉，〈鄭季宣碑〉方整古樸，頗受書學家重視。⑯ 清初許多訪碑者為求良拓都曾親訪濟寧，並留下圖、文記錄與考釋，使得濟寧諸碑在經歷元、明數百年的忽略漠視後再次受到關注。

（一）保存情況

與顧炎武同為清初振興金石學的重要人物朱彝尊（1629－1709），曾於康熙八年己酉（1669）帶著拓工在濟寧州學停留三日，見到前述五件漢碑以左二右三的方式排列在儀門內兩旁。⑰ 它們保存情形欠佳 ，毀損磨滅嚴重，據朱彝尊描述，當時〈鄭固碑〉「碑文全漫漶不可辨識」，他不得不放棄取拓；〈武榮碑〉「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魯峻碑〉「石久崩裂，僅識其百一而已」；而〈景君碑〉不僅「碑辭漶漫」而且碑陰緊靠牆壁，拓工拒拓，他只得強令施拓。⑱

漫滅難識的碑文促使學者為之進行考釋工作，文字音韻學家張弨（1625－1694以後）曾於康熙年間造訪，並在1690年寫成《濟寧州學碑釋文》一書，試圖為剝蝕的古碑作整理與紀錄。張弨字力臣，號亟齋，江蘇淮安府山陽縣諸

⑮ 朱彝尊推測〈北海相景君碑〉是梁有在元天曆年間廣搜當地碑刻時移入，惟此說未可定論。朱彝尊，〈跋相景君碑〉，《吉金貞石志》，轉引自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865。各碑著錄情形可參見楊殿珣編，《石刻題跋索引》，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⑯ 參見梅原末治等編、戴蘭村譯，《書道全集》，第二卷（臺北：大陸書店，1989），圖版78-79、86、94、108，頁183-184、187-188、190-191、194。

⑰ 朱彝尊在〈跋郎中鄭固碑〉中道：「己酉（1669）之春，泊舟任城南池之南。步入州學，見儀門旁列漢碑五，左二右三」，《曝書亭集》，轉引自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887。〈跋相景君碑〉亦說道：「濟寧州儒學孔子廟門列漢碑五，其制各殊…。」見朱彝尊，《吉金貞石志》，轉引自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865。

⑱ 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865、2887、2891、2895、28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父親張致中是明末復社領袖，精於字學，並有金石收藏。張弨少承家學，特別留心六書，愛好金石文字。張弨十七歲時父親過世，家境貧困，曾以賣書畫為生，後追隨顧炎武，為顧寫《廣韻》及《音學五書》。張弨仿效顧炎武不參加科舉、不登仕途，潛心向學，非常熱中搜羅各處古碑銘文，「遇荒村野寺，古碑殘碣埋沒榛莽之中者，靡不椎拓。」⑲據《濟寧州學碑釋文》自序，⑳張弨於己巳年（1689）春受友人邀請北行，途經濟寧州學，在當地停留了三日訪碑取拓，隨行的有兩兒一孫，又值春景清穌怡人，張弨「以皤然一老撫摩審視，督施搨具」而大笑稱快。當地士人于介菴、陳柏臺邀請張弨為漸次漫漶的古碑作考訂釋文，供州學珍藏並作收入地方藝文志之用。張弨於是參考南宋洪适的《隸釋》及其他著述，考訂前述濟寧州學的五通漢碑，及唐〈橋亭記〉、金〈党懷英書王安石四詩〉等共七件，於隔年（1690）春纂成《濟寧州學碑釋文》一卷。㉑據張弨自述，此書雖然本於洪适《隸釋》，但有兩項個人創發：一是以楷書抄錄隸書碑文，使碑文內容一目了然，較洪适「以隸釋

⑲江藩，《漢學師承記》，收入《清代傳記叢刊》，001（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一，頁15。張弨勤於訪碑、考證，曾在康熙六年（1667）冬冒著寒冷，到鎮江訪察冬天水枯時才得見的六朝摩崖〈瘞鶴銘〉，歷盡辛苦取得佳拓而回，後著成《瘞鶴銘辯》，其他著作還有《婁機漢隸字原校本》與《昭陵六駿辯贊》等。關於張弨的生平，見清末學者張朝端編，《張力臣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8）；另參見郭壽齡，〈清初考古金石家張弨〉，收入《淮安古今人物（第一集）》（《江蘇文史資料》第72輯，《淮安文史資料》第11輯）（補上出版資料，1993），頁194-197。關於張弨與顧炎武的關係，參見葛榮晉、魏長寶，《一代儒宗顧亭林》（臺北：文津，2000），頁62-63。

⑳今天張弨的《濟寧州學碑釋文》一書難得，其自序與內容則散見濟寧地方志與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各碑條下。序文見徐宗幹，《濟寧州金石志》，卷八，收入《石刻史料新編 第二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十三冊，頁9729-9730。同文亦收於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938-2939。張弨此書並有顧藹吉與潘兆遴跋，見《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940。另外，張弨還有〈和濟州學壁石刻詩韻四章有敘〉，內容亦述及這兩次到濟寧州學探碑的經過。見徐宗幹輯，《濟寧州金石志》，卷八，頁9730-9731。

㉑據十八世紀的記載，張弨並在這些漢碑上留下了墨筆題記。見潘兆遴跋， 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940。翁方綱題刻〈鄭季宣碑〉碑側：「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十有七日，北平翁方綱來觀濟寧學宮諸碑，并曹仲經、張力臣手題，與秋盒、鐵橋攷論金石，賦詩而去。」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隸」的作法更為明白；二是針對洪适改動原碑文行列，以遷就書籍編排的便宜行事作法而來，改依碑文原來的行列安排，使缺損字的位置一見便知，如此「則尋丈之全碑斂歸咫尺，仍還具體。」這些作法著眼於文字考釋，都為方便校對漫漶不清的原碑。

另一方面，書法家重視隸書點畫，對剔洗碑面、椎拓手法更為講究。隸書名家鄭簠（1622－1693）在康熙初年傾盡家產，北上山東、河北一帶尋訪古刻，十五年（1676）左右到訪山東地區，曾親自磨洗椎拓濟寧的漢碑。據稱經他清理苔蘚的碑文「鋒鏑畢出」，他還能根據刻畫的深淺來調節椎拓的輕重，結果勝過普通拓工百倍。㉒ 鄭簠並學習、臨仿這些漢碑，對他的隸書創作起了重要的影響。㉓

除文字描述、考釋與拓片，濟寧諸碑的形貌亦以縮圖形式被保留在出版於1736年的褚峻《金石經眼錄》中。褚峻（活動於十八世紀前半；字千峰），陝西郃陽人，以販鬻碑刻為業，他在《金石經眼錄》的自序中說道三十餘年的訪碑經歷：「不憚跋涉，常裹糧襆被，周遊四海九州名山大澤，遇窮崖絕壁、荒林敗塚，凡有周秦漢魏六朝隋唐篆隸真草石刻之字，書見於其間者，無不手自摹搨。然而殘碑斷碣經風霜兵火，棄置於墟莽榛棘之中，而蕪沒於缸礎牆几之用者，不一而足。……垂三十年共得碑碣千餘種矣。」㉔《金石經眼錄》即是褚峻在所收金石拓片中，挑選四十九種前人未見或見之未詳者，編輯而成的，1745年又重刊為《金石圖》。㉕

㉒ 關於鄭簠的訪碑活動，薛龍春在關於鄭簠的專論中有較詳細的敘述，見薛龍春，《鄭簠研究》，頁41-49。另參見何傳馨，〈清初隸書名家鄭簠〉，《故宮文物月刊》，92期，頁130-137；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pp. 201-204.

㉓ 現存有鄭簠紀年戊辰（1688）臨仿〈魯峻碑〉立軸，收藏在北京首都博物館，圖版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一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101，圖版京5-057。關於鄭簠的書法藝術成就，見薛龍春，《鄭簠研究》。

㉔ 見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金石經眼錄》，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集》，史部第109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年不詳），頁1b。

㉕ 《金石經眼錄》所收上起石鼓，下至曲阜某顏氏所藏東漢無名碑陰，絕大多數為東漢時期的碑銘，其中只有一種青銅器拓片，餘皆為石刻拓片。褚峻為各碑摹圖，圖後附有山東兗州滋陽人牛運震（1706-1758；字階平，號空山，又號真谷）的文字說明，記錄該碑的尺寸、所在位置，並略作碑文訓釋。乾隆十年（1745）牛運震重刊此書，並

臺灣藝術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書最特別之處在於褚峻親手繪出各碑的形狀、描摹字形，並且一一勾勒碑石上的剝蝕殘缺，作成縮本，目的在「俾人一見瞭然，而且歷歷如睹原碑完缺之形狀。」㉖ 在褚峻所作的全碑縮圖（圖1－5）中可清楚見到濟寧諸碑的碑首形狀、碑穿位置，以及碑身斷裂痕跡，亦可看出碑文漫漶缺損嚴重，呼應了朱彝尊、張弨等人的描述。五碑中尤以〈鄭季宣碑〉（圖5）的保存情況最差，不僅碑文絕大部份都已剝蝕消失，而且下半截佚失不見，殘存碑身極短；而〈鄭固碑〉（圖2）亦折裂不全，一小塊拾得的殘石附於碑旁。

（二）排列位置

中國的碑林最早約形成於十世紀，各地以孔廟或學宮為中心，有意識地集中保存古碑。㉗ 濟寧學宮亦為著名碑林之一，十七世紀後半時此地的漢碑不僅集中於戟門內且羅列整齊，顯然曾經刻意安排與保護，前述清初訪碑諸家都記述了當時所見之五碑排列位置。

朱彝尊提到五通漢碑以「左二右三」的方式排列在儀門兩旁。儀門為南北向，當參訪者順序參觀學宮內諸建築，由南邊進入儀門時，左為西，右為東；據此，西（左）側有兩碑，東（右）側有三碑。張弨在《濟寧州學碑釋文》中的記載與朱彝尊相符，他並進一步為五碑編號：㉘

增補六十件三國至唐的碑刻，改名為《金石圖》。牛運震增補的部分摹刻失真，且因欲省事，一碑僅取數字或數十字鉤摹，體例全變而價值大不如前。但《金石圖》前有乾隆六年（1741）何堂序、乾隆八年（1743）牛運震序及褚峻重作序，對褚、牛二人活動及合作的情形有較多的描述。褚峻摹、牛運震說，《金石圖不分卷》，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8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739-807。

㉖ 褚峻自序，《金石經眼錄》，頁1b。

㉗ 西安碑林與曲阜孔廟碑林是規模最大也最為人所知者。各地碑林在十八世紀時被積極擴充整頓，奠定今日所見面貌之基礎，相關討論可參見 Yun-chiu Mei,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p. 189-213.

㉘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上冊（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頁408、423、443、466、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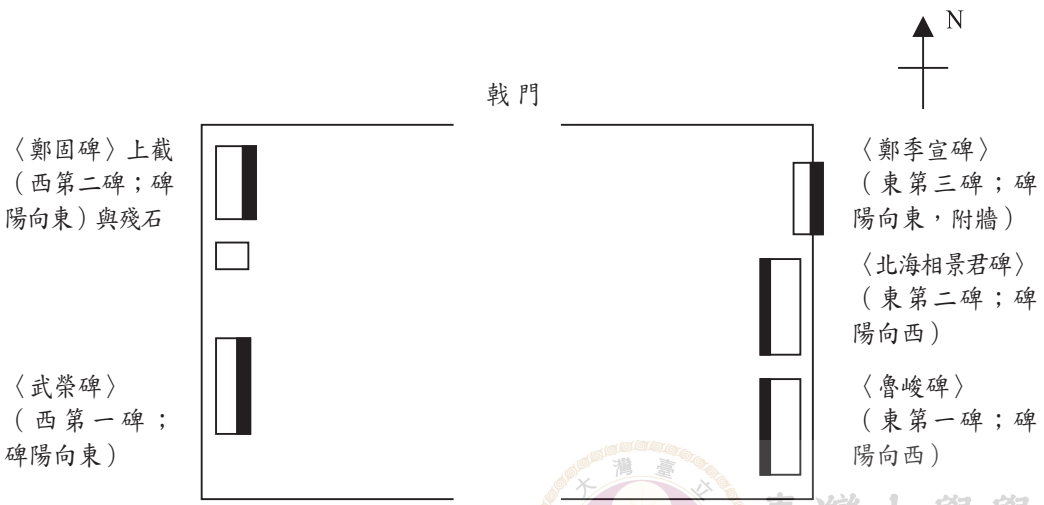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魯峻碑〉：東第一碑
〈景君碑〉：東第二碑
〈鄭季宣碑〉：東第三碑
〈武榮碑〉：西第一碑
〈鄭固碑〉：西第二碑

這樣的排列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前期，《金石經眼錄》中有更詳細的描述：㉙

〈魯峻碑〉：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
〈景君碑〉：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西向
〈鄭季宣碑〉：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東側，碑附牆，陽面東向，陰面西向
〈武榮碑〉：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
〈鄭固碑〉（連同殘石）：在濟寧州孔子廟戟門西側，東向

整合這些記載，濟寧州學五碑列於儀（戟）門內東西兩側，碑陽面面相對，惟東側的〈鄭季宣碑〉是例外，它的碑陰朝西，碑陽則貼附壁面。以下是各碑在戟門內位置重建圖（碑陽以黑條塊表示）：



㉙ 褚峻自序，《金石經眼錄》，頁42a、24a、55a、58b、29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濟寧州學的碑林雛形可能成於宋代，但各碑經元、明數百年的忽略而殘毀，直至十七世紀後半朱彝尊、顧炎武、張弨、鄭簠、褚峻與牛運震等人，或為考證訓詁、保存地方史料、書法研究或拓片買賣等因素作實地訪察，才再次受到重視，而各碑的碑文內容與現況也獲得釐清。十八世紀濟寧碑林的整理與擴充即建立在此基礎之上。

三、十八世紀濟寧當地士人的探碑

訪碑風氣在十八世紀大盛，此時濟寧出現了一批愛好金石的士人，積極擔負起保存與發掘當地古碑的工作。這使得州學的漢碑在雍正、乾隆年間獲得進一步的整頓，同時引起翁方綱、黃易等其他金石學者關注。這其中以李鶚（一作「鯤」）、李東琪父子的活動最為重要。清代的《濟寧直隸州志》中記載有李氏父子二人：

> 李鶚字化鵬，號浩齋，精於醫，工行草隸篆，性嗜金石，收藏鐘鼎圖書碑版甚富。子東琪，號鐵橋，克承父學。隸書尊經閣屏風，聖經一章其所書也。遠近搜尋古碑，遇有端倪即與黃同知易肩輿往向榛莽中，剜苔剔蘚，且摸且讀。……著有碑目二卷。㉚

李東琪尤為訪碑投入全付心力，同時人盛百二稱他「有金石癖」，「好古善隸，能繼家學」；㉛ 他後與黃易合作訪碑，交情匪淺，黃易的《秋盦遺稿》中有〈跋李鐵橋小照〉描述其好碑行徑：「……我鐵橋對酒讀書以外，惟捫碑為樂。鐵橋好碑，碑亦屢出，疑有鬼神呵護。」㉜ 此外，他為訪碑不僅出力且出錢，〈重立武梁祠記〉（1787）後的捐款人名中即有「監生濟寧李東琪錢三千」

㉚ 道光年間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八之四，第六冊，頁2397。

㉛ 盛百二，〈跋漢故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柚堂文集》，轉引自道光年間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918-2919。

㉜ 黃易，《秋盦遺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行。㉝

李氏父子等濟寧士人努力保存當地金石遺蹟，對後來黃易的訪碑工作有極大幫助，他們在雍正、乾隆年間對當地古碑的發掘有：

（一）〈鄭固碑〉全貌再現

明末清初的著錄皆稱〈鄭固碑〉僅存篆額與碑上截約二百五十餘隸字，其餘部份佚失不見，斷裂年代已不可考。㉞ 雍正六年（1728）時，李鵬於孔廟泮池左發現了一塊殘石，因推斷其為〈鄭固碑〉的最下截而置於碑旁。然與南宋洪适《隸釋》中所錄的釋文相對照，此碑尚缺中段。在發現殘石的五十年後，也就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間，李鵬之子李東琪與定海藍嘉瑄（號瘦竹，時任別駕）將碑身從地面升起，才發現原來有高約一尺的部份被掩埋在地裡，〈鄭固碑〉終於得以全貌再現。㉟

圖6是升碑後全石拓，㊱ 在泮池左發現的殘石（上有二十餘字）是碑的下段（Ａ）；新出土的部份（上有六十餘字）是中段（Ｂ）；而一直外露的部份（上有二百五十餘字）是上段（Ｃ）。若與褚峻所繪之〈鄭固碑〉縮圖（圖2）相對照，尤能看出升碑前後的差異。李氏父子的發現糾正了長久以來的誤解，翁方綱為此感到十分興奮，他在《兩漢金石記》中詳記發現事由，並與《隸釋》進行精細比對，宣稱「所闕亦不甚多。」㊲

（二）掘得〈膠東令王君廟門碑〉

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望，李東琪在濟寧州學大成殿西階下驚喜發現

㉝ 傅惜華編，《漢代畫像全集二編》（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0-51），頁157。

㉞ 如前文提及的朱彝尊、張弨、褚峻與牛運震等人的記述，還有顧藹吉編纂的隸書字典《隸辨》。顧藹吉，《隸辨》，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6；2003重印），頁249。

㉟ 徐宗幹輯，《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75-9478。

㊱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㊲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膠東令王君廟門碑〉斷碑：

> 大成殿西階下有古樹，根空，以片石耆拄，與樹相銜不可脫，其來久矣。鐵橋李子東琪有金石之癖，一日徘徊其下，疑此石有異，洗之無所有。其內向一面不可見，探手辨之覺有文，遂以紙墨摩之，得隸書二十餘字，稽之洪氏書，知其為膠東令碑。……康熙時淮陰張力臣撰濟州學碑釋文，未見此石，續而釋之，自在我鐵橋矣。㊳

此碑紀年魏黃初五年（224），曾經趙明誠《金石錄》及洪适《隸釋》、《隸續》著錄，然久佚失不見，經李東琪之探摩才重見天日。翁方綱、黃易為之賦詩作畫，翁方綱的〈得石圖歌〉描述道：

> 張君（弨）曾釋濟寧碑，此石當時不為出。
> 李生（東琪）後張又百年，日月遐思訪遺佚。
> 一朝坐臥長松底，月下松皮黑如漆。
> 此松想像何年植，洪釋淳熙未成日。
> 蘚沒奇文不自安，特逢老鐵（李東琪）來容膝。
> 一道孤光走如電，凜若蒼茫神鬼叱。
> 鐵（李東琪）也大叫碑在此，鉏鑊忙施縱即失。……㊴

翁方綱或許過份誇大了發現過程的戲劇性，但卻生動呈現了李東琪日夜記掛古碑、孜孜尋求隻字片石的形像。

（三）發現〈漢廬江太守范式碑〉斷碑

㊳ 盛百二，〈跋膠東令王君廟門碑〉，轉引自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918-2919。此跋有簡略版在另行出版的《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500。

㊴ 翁方綱，〈得石圖歌〉，《復初齋集外詩》，在劉承幹編，《嘉業堂叢書》（浙江吳興：嘉業堂，1918），卷十五，頁8a-b。翁方綱在標題下自注：「圖為黃小松畫濟寧李鐵橋於州學古松下得「漢膠東令王君廟」碑事也。事在乙未夏，予已有詩。」翁方綱為此次發現另作有〈濟寧州學新掘得膠東令王君斷碑〉詩一首，《復初齋詩集》，卷十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461。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漢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三國魏青龍三年（235），碑主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今山東金鄉縣）人，累官荊州刺史，遷廬江（今安徽霍丘縣附近）太守。此碑隸書結字方寬，多裝飾性的方折勁利用筆，是曹魏著名碑刻之一。㊵

此碑原在山東任城，被移至學宮，後來斷裂並沒入土中，直到乾隆晚期才陸續在濟寧州學附近尋得兩塊殘石。首先，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二十六日，膠西崔儒眎（墨雲）在州學西南龍門坊水口石岸下尋得碑額，有篆書「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十字，次日此石被移置州學戟門內〈鄭固碑〉之旁。㊶接著，乾隆五十四年（1789）暮春，李東琪在州學櫺星門西再掘得碑身殘石，隨即與早前出土的篆額重合。李東琪有跋刻於碑額下方自述發現經過（圖7）：

> 乾隆己酉（1789）暮春，琪督工拓碑於州學，適步櫺星門西，見壁根片石甚古，訝為漢物，拂拭之，隱隱有隸書數人名，急掘洗之，乃范式碑也。不禁狂喜，遂與先得之額並列焉。㊷

李東琪所發現的是〈范式碑〉的上截，存十二行，每行6-15字。此石的發現及與篆額的重合為當時盛事，當時已在濟寧任官並廣搜當地金石的黃易非常關心此事，不僅助立〈范式碑〉（前引李東琪刻跋後有「錢唐黃易助立」一行隸字），並在殘石碑陰刻跋道（圖8）：

> 范巨卿碑額既出後正碑久尋不得，易有古搨本，方思補刻。今李鐵橋尋獲原（？）石，復見碑陰字數雖缺而體勢森嚴，神味完足，實為快事。乾隆己酉（1789）三月，錢塘黃易。㊸

翁方綱對〈范式碑〉的殘石出土與重立亦感振奮，其《兩漢金石記》當時

㊵ 參見梅原末治等編、于還素譯，《書道全集》，第三卷（臺北：大陸書店，1989），頁167。

㊶ 徐宗幹纂，《濟寧直隸州志》卷九之二，第七冊，頁2923-2928。另可見徐宗幹輯，《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95-9498。

㊷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㊸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已刻版完成，但仍特別將新出斷碑收錄在補遺中。㊹ 翁方綱為此亦作有〈李鐵橋於濟寧學掘得范式碑，賦此奉寄兼呈小松〉詩一首，寄與李黃二人，對其發現大加稱許。㊺

現將雍正、乾隆年間濟寧當地士人發現與保存州學古漢碑的情形整理為簡表如下：

時　　間	事　　件
雍正六年（1728）	當地士人李鵾於孔廟泮池左發現了一塊殘石，因推斷其為〈鄭固碑〉的最下截而置於碑旁。
乾隆四十年（1775） 四月望	李東琪在濟寧州學孔廟大成殿西階下的纏繞古樹根間發現〈膠東令王君廟門碑〉斷碑。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六月間	李鵾之子李東琪與定海藍嘉瑄（號瘦竹，時任別駕）將〈鄭固碑〉碑身從地面升起，才發現此碑原來有高約一尺的部份被掩埋在地裡，為碑中段。
乾隆四十三年（1778） 六月二十六日	膠西崔儒眔在濟寧州學西南龍門坊水口石岸下尋得〈范式碑〉的碑額，有篆書「故廬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十字，次日此石被移置州學戟門內〈郎中鄭固碑〉之旁。
乾隆五十四年（1789） 暮春	李東琪在濟寧州學櫺星門西再掘得〈范式碑〉碑身殘石，隨即與早在十一年前出土的篆書碑額重合。黃易助立。

由上表可知，濟寧當地士人主導的古漢碑發現與保存，在雍正朝僅有李鵾發現〈郎中鄭固碑〉最下截一例，乾隆四十年（1775）後則快速累積，尤其在四十三年（1778）六月間即有兩例。這自然與乾隆中後期全國訪碑風氣盛行有關，而金

㊹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89-501；卷二十一，頁1111-1121。
㊺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三十八，頁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學家黃易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起在當地任官並廣搜金石則應該發揮了極大的影響。以下即集中討論黃易到任濟寧後對當地漢碑的考察與發現。

四、黃易到任與州學古碑的整理與擴充

黃易（1744－1802）字大易，號小松，又號秋盦，浙江錢塘人。父黃樹穀，號松石，稽古力學，工篆隸書，在家鄉立廣仁義學，並精究河防事宜，曾著河防私議。黃易承繼家學，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起在山東治河運，前後共二十六年，期間兩任兗州府運河同知，兩次遇乾隆皇帝南巡回鑾，經運河辦有功，兩護運河兵備道事。二十六年間黃易僅有約兩年時間不在山東任官：乾隆六十年（1795）丁內艱扶柩歸葬，嘉慶二年（1797）才回山東任職。他最後於七年（1802）病逝任上。㊻ 在山東期間黃易藉地利之便，探訪當地的東漢與六朝碑，有許多重要的發現。關於他在山東的完整訪碑行跡與相關活動需另外專文研究，本文僅就與濟寧州學相關者作討論。

黃易在濟寧的訪碑成就除得力於李東琪等當地人士的協助，亦與時在北京任官的翁方綱有密切關係。黃翁兩人的「金石之交」始於1770年代，時翁方綱補《四庫全書》纂修官，專辦金石、篆隸、音韻諸書，他校勘書籍之餘考訂金石、架收拓本，與朱筠、錢大昕、張塤、陳以綱、孔廣森、桂馥等金石學家時相過從討論，其中亦包括黃易。㊼ 1777年秋，翁方綱借摹黃易的〈漢石經殘石〉拓本上石，並用南宋洪适摹刻石經於越州蓬萊閣事，而自題扁曰「小蓬萊閣」。翁後來發現黃易亦自號書齋為「小蓬萊閣」，兩人不謀而合，因此在黃

㊻ 關於黃易的家世與生平，見潘庭筠，〈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錢唐黃君墓志銘〉，附於黃易〈山水圖冊〉（紀年1766）後，現藏浙江省博物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一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131，浙1-603；翁方綱，〈黃秋盦傳〉，《復初齋文集》，卷十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471-472。

㊼ 翁方綱，〈家事略記〉，轉引自沈津輯，《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02），頁66-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石經拓本冊首題「蓬萊宿約」四字。㊽ 同年十月，黃易將離京赴山東任官，友人賦詩送之，翁在詩冊首題「金石盟言」，昭示兩人的深厚交情。㊾

黃易赴山東任官後，仍與翁方綱保持密切聯繫。每當黃易得古拓本，即立刻寄予翁方綱要求題識，而若有新發現的古碑，亦製作精拓，寄予翁方綱賞鑑。諸如前文述及的〈漢廬江太守范式碑〉，黃易於1783年得宋拓本，原石於1789年由李東琪尋得，翁方綱皆在短時間內接到黃易的告知，並奉寄拓本，翁則將最新發現收納於他的《兩漢金石記》中。㊿ 除此之外，當翁方綱考碑遇疑問時，亦要求黃易就近親探原碑、製作佳拓，這些要求意外使得濟寧州學的漢碑獲致珍貴的新發現。

（一）釐清〈魯峻碑〉碑陰錯植問題

為釐清立於濟寧州學戟門內的〈魯峻碑〉碑陰究竟有幾列捐款人名，翁方綱在乾隆甲辰年（1784）間囑付黃易親至碑下，手拓其陰。翁方綱回憶道：

> 是碑之陰，顧南原（藹吉）云凡三列，下一列漫漶，存者二列。吳山夫（玉搢）亦沿其說。然拓本皆止拓其上二列而已，不知其下半段尚有字否。甲辰（1784）秋，屬黃小松親至碑下手拓之。其陰高五尺八寸，與碑正面相同，而二列之下乃實無一字。著錄相沿之不可信如此，此一紙當為左券矣。舊所稱魯峻碑陰者，非此碑陰也，蓋由洪氏隸釋誤以他碑之陰，目為魯峻碑陰耳。洪氏在南宋時未得親見此碑也。乾隆壬子（1792）三月按試至此，親到碑間題字於石頂之側。㊿㊀

㊽ 翁摹本見〈翁方綱重摹石經殘石并識〉，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自題扁「小蓬萊閣」事見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三，頁127-128；沈津輯，《翁方綱年譜》，頁107-108。

㊾ 沈津輯，《翁方綱年譜》，頁109。

㊿ 黃易於1783年夏從王古愚處得此碑宋拓本，九月有信告知翁方綱，拓本則於十二月寄達翁手。翁方綱製作響搨一本，並題識。見黃易跋范式碑，《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第四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95。李東琪於1789年暮春尋得原碑，翁方綱在同年六月至九月間有詩〈李鐵橋於濟寧學掘得范式碑，賦此奉寄兼呈小松〉，並將新出土原碑補收入出版於同年八月左右的《兩漢金石記》。見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三十八，頁22；《兩漢金石記》，卷廿一，頁1111-1121。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果除了證實碑陰捐款人名僅有二列，翁方綱並據黃易新拓的原石拓本糾正洪适《隸釋》中的碑陰錯植的問題（《隸釋》所錄實為〈范式碑〉之碑陰）。依恃黃易親至碑下取拓所得的確切證據，翁方綱毫不留情地批評洪适《隸釋》、顧藹吉《隸辨》、吳玉搢《金石存》等前代著錄的錯誤。翁的同一跋亦見於《兩漢金石記》卷八，只是文字稍有更動增減。在《兩漢金石記》的版本中，翁更進一步指出，此碑的實際高度為五尺八寸，而非牛運震在《金石圖》中所宣稱的八尺五寸，「蓋著錄之不可憑如此」，顯然深深信服訪碑實證研究的有效性。[52]

（二）重立〈鄭季宣碑〉

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翁方綱交代黃易一項性質類似的任務，此次目標是立於戟門東側，碑陽緊貼牆邊的〈鄭季宣碑〉。

據南宋洪适的《隸釋》記載，此碑碑陽有篆額，然乾隆初年出版的褚峻《金石經眼錄》，還有清中期吳玉搢的《金石存》等多書卻皆未載碑額有字，而翁方綱即使在極精的舊拓上亦遍尋不著此篆額，他在《兩漢金石記》中歎道：

> ……洪云篆額穹碑，多有裂紋。據此則是碑上方必有篆額，而今日雖極精之舊拓本，亦無復知其篆額者矣。且牛氏金石圖竟云無額。即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山陽吳山夫近日留心金石者也，而所撰金石文存於是碑正面止以‘殘缺僅存數字’一語了之，並不著其僅存者為何字，亦可慨矣。[53]

此碑篆額有無之所以難決的一大原因是，此碑碑陽緊靠壁面，以致拓工無法取得清楚的拓本。翁方綱記道：

> ……蓋土人所名為鄭季宣碑者，皆其陰也。是以碑正面雖有字，而人不之

---

[51] 翁方綱，〈跋魯峻碑陰〉，《復初齋文集》，卷二十，頁550-551。
[52]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14-415。
[53] 此跋未紀年。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拓。且聞其正面偪牆甚近，拓工不能以身側入，須二人從兩邊各以手探入拓之。此所以正面拓本得之者甚艱。㊹

為了釐清碑陽究竟有無篆額，翁方綱要求黃易取拓。黃易在為此碑所作的跋中說明了當時遇到的困難：

右碑在濟寧州學戟門之東，正面向壁，下半久埋土中。康熙年間淮陰張力臣作釋文已稱碑字半沒，亟宜出之。乾隆丙午（1786）夏，翁覃溪詹事欲易搨致碑額。碑去壁不盈尺，工人伸紙頗難。上方泐深寸許，額字不復見。㊺

由於碑陽離壁面太近，拓本難取，靠目視亦無法確認碑額部分是否有字，翁方綱於是驅使黃易將半埋於土中的碑身完全升起並將碑陽轉向外。黃易照辦，並在跋中描述了戲劇性的升碑過程：

詹事（翁方綱）復趣易升碑甚力。工師見石質鬆裂，不敢移動。易銳意辦此，裹毯紲索，百指一心，出土無損。作二石柱夾之，嵌置堅牢，兩面皆露。數百年沈埋之蹟，一旦復見，真平生快事也。凡全石高六尺，寬三尺，并鐫跋碑側以志之。㊻

經過大費周章的升碑、重立、固定，〈鄭季宣碑〉的陽、陰兩面終於同時揭櫫於世。翁方綱很快即收到黃易寄來的新拓，他記道：

㊹ 此段文字紀年壬寅（1782）八月八日，翁方綱在其中並評論牛運震《金石圖》中所摹此碑拓本之所以缺中間一行，乃因為此行為兩邊手探所不及。見《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44。

㊺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63。

㊻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63-464。黃易在此跋最後提到鐫跋碑側以志之，其鐫於碑側的文字今尚可見，并有拓片流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正面向壁，其下久埋土中，翁詹事方綱欲顯全文，屬衛河通判黃易升碑向外，乃與知濟寧直隸州事劉永銓、王所禮成其事，碑字復全，殊可快也。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十六日，黃易題記，李東琪同來。」（圖16）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並載於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64；《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88。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予因札致黃小松全拓其正面，今得小松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空。中間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橫寬三寸（應為「尺」之誤），而正面穿上之額竟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小松札云其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施椎即落。拓時本欲去其下座，升高驗下半有字否，因石質一動即損，即不敢更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內高，所以正碑短而碑陰長也。丙午（1786）六月十日記。[57]

五十年前《金石經眼錄》記載此碑寬三尺，高僅四尺；黃易的新拓顯示重立後的碑可拓之處高了六寸，只可惜由於碑額部份石表鬆脫，毀損嚴重，終究還是無法辨認是否有字。然而翁方綱對於升起此碑仍是十分興奮，仔細比對新舊拓本與著錄記載，收在三年後出版的《兩漢金石記》中（詳第五節）。

（三）發現武梁祠堂畫像石群、〈武氏石闕銘〉與〈武斑碑〉

除了因應翁方綱的考碑疑惑而清理重拓古碑，黃易亦積極地四處查探碑石遺蹟。他曾遣工搨得〈肥城孝堂山石室〉、〈朱鮪畫像石室〉，亦曾在嘉祥洪福院佛座下一石搨得「成王」、「周公」、「魯公」等字，推斷為某東漢畫像石室的遺蹟。在多次探訪中最重要的發現是武氏祠堂畫像石刻群與碑刻。

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夏季到秋季對黃易及他的金石伙伴而言，是收獲特別豐富的時期。黃易除了重立〈鄭季宣碑〉，八月遣人探訪嘉祥縣南紫雲山麓的所謂「西漢太子墓石享堂」，帶回的竟是武梁祠與武斑碑的拓片。狂喜之下，黃易在九月親自前往，終發現久已佚失的三座武氏祠堂、石闕一對，以及〈武斑碑〉的原石。關於黃易尋得這些石刻的過程，2005年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的武氏祠特展圖錄有詳細的介紹，筆者在此不再重複。[58] 黃易一如往常，很快地將拓本寄至翁方綱的手上，翁方綱將之與著錄及當時認定為時代最早的一冊武梁祠拓片（揚州汪雪礽藏，傳為唐拓）作仔細比較，結果顯示黃易的發現所得不僅傲視其他拓本，且還能補充、改正洪氏《隸釋》《隸續》所載。[59] 除「武梁祠堂」，黃易的拓本還包括「前石室」畫像與「祥瑞圖」，兩者完全

[57]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45-4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見載於洪适或前人各種著錄，[60]整體言之收穫非比尋常。

隔年（1787）六月，黃易在濟寧當地士人李東琪、李克正、南正炎等人的幫助下，於畫像石發現原地建立祠堂，將石刻嵌於四壁，就地保存。他原想將〈武斑碑〉移至濟寧州學，與原有的〈武榮碑〉並立，無奈石材厚大不易搬運，只得將之留在原地，立於祠堂中央。[61]黃易最後僅將「孔子見老子」一石移至州學，嵌於明倫堂壁。[62]

（四）尋得〈朱君長題字〉殘石

直至黃易於1795年丁內艱扶柩歸葬錢塘，濟寧州學又陸續增加了兩件漢碑：一件是前文提及的〈范式碑〉，於1789年由李東琪在櫺星門西掘得，後立於戟門西側；另一件是〈朱君長題字〉，黃易在其上題刻道：「乾隆五十七年（1792）四月錢唐黃易得於兩城山下，審為漢刻，移立濟寧州學」，翁方綱亦

---

[58] 黃易撰有〈修武氏祠堂記略〉（1787），是最主要的一手文獻材料，收在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80-885。Cary Liu, "The 'Wu Family Shrines' as a Recarving of the Past," in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pp. 23-97. 並參見Wu Hung,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pp. 3-70.

[59] 黃易拓片改正《隸釋》9字，補73字；洪有而今泐者12字。翁方綱跋武梁祠堂拓片，乾隆丁未（1787）正月廿六日，見《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50-851。

[60] 關於「前石室」畫像的描述及討論，見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55-874。「祥瑞圖」部分見卷十五，頁874-880。

[61] 見黃易〈修武氏祠堂記略〉，紀年乾隆丁未（1787）夏六月，收在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80-885。翁方綱有〈重立武氏祠石記〉，刊碑立於祠前，碑陰則刻有海內樂捐人名八十餘位及各人捐錢數目。見傅惜華編，《漢代畫像全集二編》（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0-51），頁156-157。翁記並載於《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85-8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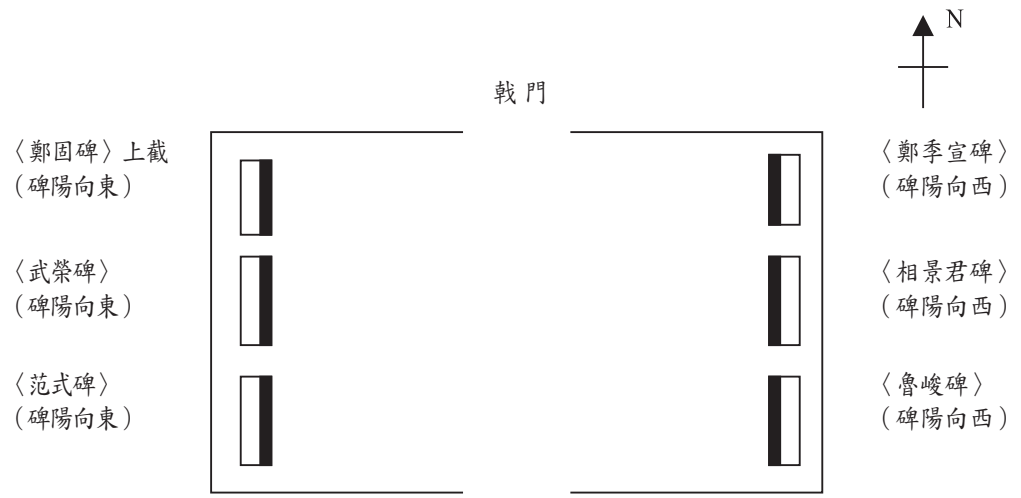
[62] 黃易，〈修武氏祠堂記略〉，《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83。黃易在此石後刻跋：「孔子見老子畫象載洪氏《隸續》，乾隆丙午（1786）冬錢唐黃易得此石於嘉祥南三十里武宅山，敬移濟寧州學。鄭支宗、李東琪監立。」翁方綱在《兩漢金石記》中對此石與著錄的比較有仔細的討論，《兩漢金石記》，卷十五，頁853-855。

臺灣人臺灣藝術 期刊資料庫

以漢隸權威的口吻題刻其上，以書風斷其為漢代作品（圖9）。[63] 此石後來被嵌於明倫堂壁。

濟寧州學的漢碑在十七世紀後半只有五件，經過十八世紀，尤其是1770年代以後當地士人與黃易的積極經營擴充，不僅面貌一新，數量亦增加。翁方綱在1793年數了數，歸納出十件，較原有數量倍增。翁方綱〈濟寧學宮及普照寺觀碑四首〉中的第三首道：「已倍前賢獲，任城漢十碑。」小字自注則細數各碑：「舊云任城五碑，謂〔景君〕、〔魯峻〕、〔武榮〕、〔鄭固〕、〔鄭季宣〕也。今增〔范式〕、〔王君〕、[64]〔鄭固下截〕及〔孔子見老子畫像〕與〔朱君長碑〕而十也。」[65]

這些新獲碑大件者立於戟門內，小件殘石嵌於明倫堂壁間。在戟門內者，西有〈武榮碑〉、〈鄭固碑〉及新增的〈范式碑〉；東則有〈魯峻碑〉、〈景君碑〉及重立後的〈鄭季宣碑〉，排列如下：



[63] 翁方綱刻跋〈朱君長題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並載於《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91。

[64] 即李東琪於1775年在大成殿西階下的古樹根間發現的〈膠東令王君廟門碑〉斷碑。

[65] 詩全名為〈四月二十五日由南池太白樓浣筆泉至濟寧學宮及普照寺觀碑四首〉。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四十四，頁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嵌於明倫堂壁間者則有（按移入時間先後排列）：[66]

碑名	位置	尋獲地點、時間、負責人	移入明倫堂時間
1.〈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	「明倫堂東北壁上南向」	1775年4月15日，李東琪得於大成殿西階下古樹根間	c. 1775
2.〈鄭固碑〉殘石	「嵌明倫堂東壁」	1728年李鶚獲於泮池左，置於戟門內西側鄭固碑旁	不明，可能當1778年李東琪與藍嘉瑄掘出鄭固碑中段時
3.〈孔子見老子畫像石〉	「在州學明倫堂壁間」	1786年9月，黃易發於嘉祥縣紫雲山下	1786年；黃易與州牧劉永詮移入
4.〈朱君長題字〉	「明倫堂東北壁上南向」	1792年4月，黃易得於兩城山下	c. 1792

濟寧當地的探碑傳統在十九世紀仍延續，明倫堂的收藏亦持續增加。道光十九年（1839）魚臺馬星垣訪得〈漢永建五年石刻〉於兩城王鳳林，移至魯橋藏於家，二十一年（1841）四月刺史徐宗幹將之移至濟寧州學，置明倫堂東壁。[67] 發現者馬星垣的號為「鐵橋」，與李東琪的字相同，或許有效賢之意。

在前述濟寧州學的漢碑發掘過程中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一是此時期訪碑並非個人活動，參與者至少包括駐於當地的官員學者（黃易）、當地士人（李東琪），還有外地的金石同好（翁方綱），三者共同形塑訪碑的進行與論述。二是訪碑活動與拓本研究有其自身歷史脈絡，翁、黃等人將自己置於上承宋代與清初前輩的譜系中來檢驗其成果。三是由訪碑與古碑研究衍生出了多樣的文化產品，如翁方綱的詩與題跋。若我們回想清初以來顧炎武、朱彝尊、張弨、褚峻等人的訪碑活動，不論就規模或深入程度而言，十八世紀後期的情形絕非前代能及。

[66] 徐宗幹輯，《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74、9478、9491、9500。
[67] 徐宗幹輯，《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考釋、詩文題跋與圖繪

翁方綱與黃易不僅合作推動濟寧的探碑，且留下為數眾多的考釋、詩文題跋與圖繪，此節將進一步解析兩人的文與圖，來檢視他們如何看待、論述與呈現在濟寧的訪碑活動及成果。

翁方綱對濟寧漢碑的校定與整理主要收在《兩漢金石記》中，他仔細比對著錄與新舊拓本的作法前文已略觸及，筆者在此欲以〈鄭季宣碑〉為例更具體地討論探碑所得新材料如何影響他的考釋工作。翁方綱在《兩漢金石記》中搜羅、比較了數個〈鄭季宣碑〉碑文版本（包括著錄與拓本），現依各本年代先後稍作整理如下表：[68]

	1.洪适《隸續》著錄（1167）	2.翁舊藏拓本（時代不明）	3.張弨《濟州學碑釋文》著錄（1690）	4.褚、牛《金石圖》著錄（1745）	5.黃易新得全石本（1786）
碑陽	*有篆額 *碑身有字18行，共270餘字	*無篆額 *碑身存字16行，共48全字、3半字	*無篆額 *碑身存14行，共43字	*無篆額 *碑身存12行，共35字	*無篆額 *碑身存16行，共約73全字、5半字
碑陰	*篆額8字橫書 *碑身有4列人名，共273字	*篆額8字橫書 *碑身存1列人名，20行，共91全字，5半字	*篆額8字橫書 *碑身存1列人名，20行，共100字	*篆額8字橫書 *碑身存1列人名，20行，70字	*篆額8字橫書 *碑身存2列人名，20行，共約145全字，8半字

表列第二種版本為翁方綱舊藏拓本，翁並未交代此本年代，然據所存字數判斷，年代或與張弨《濟州學碑釋文》相去不遠。由此表可看出，隨著時間演進，碑石毀損愈趨嚴重。從《隸續》到《金石圖》的近六百年間，〈鄭季宣碑〉的碑陽篆額失無可尋，碑文字數由270餘字降至35字；碑陰則由4列捐款人名共273字，降至1列人名，僅存約70字，損失極為慘重。黃易在1786年受翁方綱之託升起重立〈鄭季宣碑〉是此碑研究史上的重要突破，新得全石拓本上能

[68]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30-4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辨識的碑文字數雖仍遠不及《隸釋》所載，但已大幅超過清初以來各本。

除計較字數多寡，翁方綱亦追究各本彼此矛盾或可互相補足之處。他的校對工作做得極細，盡可能呈現碑文的原本行列安排，標明缺字數目及位置，並有詳細的註解。圖10是〈鄭季宣碑〉升碑後新出部份在《兩漢金石記》中的呈現（「補全今石所見漢尉氏令鄭季宣碑」）：碑文各行分列，行首註明行數，下方以楷書錄寫碑文，若有殘字則依樣畫出，例如第二行下有「五」、「仆」與「之」三字，行末小字注：「〔五〕字向所嘗露見也，自此字以下則新昇出土者耳。〔之〕上一字洪氏所闕，今諦審似是〔緯〕字。」[69] 新出石不僅能用以校訂清初著錄與拓本之缺，更重要的是還能補洪适著錄之不足。翁方綱最後總結，能補《隸續》者共有九字，得意之餘亦等於宣示訪碑為實證考碑之最有效方法。[70]

翁方綱於1786年寄贈黃易的一首長詩〈小松以肥城孝堂山漢畫象石本見寄賦此奉酬〉最後寫道：「濟上苔岑動新綠，石盟為我歡古顏。」後有小字自注：「欲煩升立尉氏令（鄭季宣）碑也。」[71] 濟寧的古碑上又生了新的綠苔，翁方綱希望黃易這位因金石愛好結成的盟友為他清理，讓古碑重展歡顏。〈鄭季宣碑〉的升碑、重立與新拓之過程正充分說明翁、黃二人在這段期間的密切合作；而翁方綱的主動請託，還有他對著錄、舊拓及新拓的鑽研比對，亦揭示了訪碑與考碑相互牽動的關係。

翁方綱雖密切關注黃易等人在濟寧的訪碑活動，並以考釋碑文的方式參與其中，然他直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才有機會親炙這些漢碑。此年三月，時任內閣學士的翁方綱因公過山東濟寧，他趁著公務閑暇，到了州學的儀門下瞻仰摩挲漢碑，盤桓許久而去。他此行並受黃易邀請，至官舍一同觀賞黃易收藏的拓片，相談甚歡。黃易到任山東至此已有十三年，期間兩人經常書信往來卻無緣相見。最後黃易為闊別後的相逢作了圖繪留念，翁方綱為之作〈濟寧學宮觀碑歌〉道：「……闕里昨來聽鐘鼓，戟門風響交檜桫。黃子繪圖縮小冊，他

---

[69]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59。

[70]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60。

[71]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三十二，頁652。此詩未紀年，惟《復初齋詩集》依年月先後編排，此詩時間落在丙午年（1786）正月至八月間。

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詩話留濟寧。我歸直廬手畫肚，蠅頭隸古成春蠶。」⑫ 此外，翁方綱並以混雜著欣喜、感慨以及與有榮焉的心情寫下三首絕句：

張弨鄭簠同來否，片石摩挲意不傳。
多少精微待親質，等閒拋卻十三年。丁酉與秋盒別，至今十三年矣。

任子城陰接海潮，蓬萊幾客託山樵。
月明梧竹疏疏影，又借秋盒識鐵橋。

山城駐馬傲鄱陽，石闕重開記武梁。
半晌茶煙千載事，漢碑圖畫出文章。
—秋盒署齋觀所藏金石，秋盒為作圖，同賦三首 三月十七⑬

翁方綱的這三首詩意在紀念與黃易的重逢，內容則處處指涉與濟寧當地漢碑相關的其他人事物。第一首中的音韻學家張弨與書法家鄭簠，皆曾在康熙年間親訪濟寧的漢碑，張弨並有考釋濟寧漢碑的著述傳世；第二首提及的「鐵橋」即濟寧士人李東琪，是黃易在當地搜尋古碑刻的重要幫手；第三首則直指黃易發現漢代武梁祠畫像與榜題原石的重大成就，足以傲視南宋金石學家洪适（江西鄱陽人）。翁方綱一方面大力稱許黃易的訪碑成就超越前人，一方面藉著提點這些訪碑的點滴來為彼此的友誼作注腳。翁方綱自己的漢碑著作《兩漢金石記》甫於前一年（1789）付梓，書中收納了黃易與李東琪在濟寧的所有新發現。隔年（1790）三月翁才第一次親到這些漢碑下，同時也在黃易的介紹下首次與李東琪見面，感懷激動之情可以想見。

翁方綱此行不但賦詩紀念，而且作跋，囑人刻在碑上。在〈鄭季宣碑〉的碑側留有翁方綱的刻題寫道：「乾隆五十五年（1790）春三月十有七日，北平翁方綱來觀濟寧學宮諸碑并曹仲經、張力臣手題。與秋盒、鐵橋攷論金石，賦詩而去。」（圖11）⑭

⑫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三十九，頁35。
⑬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三十九，頁35。
⑭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後翁方綱於1791年秋至1793年中任山東學政，在山東各地按試並考選學生，[75] 期間又曾兩過濟寧州學觀碑並與黃易見面。首先於1792年2月底，翁方綱將過嘉祥、濟寧等地，他在與黃易的信札中告知自己將於三月初抵達，安排與黃易見面敘舊及拜會官員，並表達了探訪武氏祠堂的意願：

> 前一天弟到加祥，昨已告知邑宰劉君（永詮），欲順便往看武氏諸石，第不視紫雲山在何處？還是先到紫雲山，而後至嘉邑？抑先到縣，而後到紫雲乎？亦求示知，以便計算途程耳。[76]

但紫雲山在嘉祥縣城外，地處偏僻，並非易至之所，翁方綱又因行程緊湊，終究無緣探訪。[77] 三月三日翁方綱抵濟寧，黃易具舟相迎。[78] 翁僅在此停留一天左右，仍不忘造訪州學漢碑，題字於〈魯峻碑〉石頂之側，[79] 並在〈鄭季宣碑〉的另一碑側留下書刻：「壬子（1792）三月三日，翁方綱按試過此，與秋盦摩挲是碑，穿左有直紋一線，知額是陽文也。」（圖12）[80] 此時距翁方綱趨使黃易升碑已近六年之久，兩人仍無法忘懷苦尋不著的碑陽篆額，竟由一線直紋肯定它的存在，並大膽推測為陽文。此後相繼來訪濟寧漢碑的學者極多，包括阮元、武億、張塤等人，亦皆題刻碑上，形成如同書畫手卷題跋般的往復對話。

1793年4月25日翁方綱再過濟寧州學，作了〈濟寧學宮及普照寺觀碑四首〉，[81] 並有〈四年三至詩并序〉，自述1790年春至1793年春四年期間共三度

---

[75] 參見沈津，《翁方綱年譜》，頁290-319。

[76] 轉引自沈津輯，《翁方綱年譜》，頁296-297。

[77] 翁方綱跋黃易〈得碑十二圖冊〉的「紫雲山探碑圖」一景，歎道：「及來山東，兩至嘉祥，而以行役有程，不及入山踐此勝約，為可憾也！」《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頁216。

[78] 參見沈津，《翁方綱年譜》，頁298。

[79] 翁方綱，〈跋魯峻碑陰〉，《復初齋文集》，卷二十，頁551。

[80]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此側尚有黃易、李東琪、武億、鄭際唐、張塤、李克正、李學曾等多人跋或觀款。

[81] 詩全名為〈四月二十五日由南池太白樓浣筆泉至濟寧學宮及普照寺觀碑四首〉。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四十四，頁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訪濟寧州學。[82] 翁方綱的這些詩極力歌詠與黃易藉著金石愛好建立起的深厚友情，同時大加讚賞黃易與李東琪的訪碑貢獻，為他們的活動籠罩上開疆闢土的浪漫氛圍。

另一方面，黃易除了本身積極訪碑，對成果的整理及呈現亦不遺餘力，留有題跋、評論文字與圖繪記錄。他將在濟寧的訪碑活動畫於〈得碑十二圖冊〉中，此冊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約作於1793年末至1794年初，[83] 內容記錄1775年至1793年的訪碑活動：

冊頁順序	事　　件	事件時間	牽涉之古碑原石或拓本
1	三公山移碑	1775年	黃易客居南宮（今河北省南宮市），請託友人在元氏（今河北元氏縣）訪得〈祀三公山文〉，翁方綱訂為東漢元初四年（117）。屬縣令移置龍化寺，與〈白石神君碑〉並立
2	詩境軒賞碑	1777年8月	黃易攜董姓友人所贈〈熹平石經__尚書、論語殘字三段〉拓本一冊，赴翁方綱的詩境軒與三五好友同觀
3	肥城孝堂山石室	1786年	黃易遣工搨山東平陰縣孝堂山（今屬長清縣）頂石室畫像，得「成王」、「相」、「胡王」等字，推斷其為趙明誠《金石錄》中提及之〈郭巨石室〉
4	濟寧學宮升碑	1786年6月	黃易受翁方綱之託，升起濟寧州學戟門內之〈鄭季宣碑〉並重立
5	紫雲山探碑	1786年9月	黃易與李東琪、李梅村、南明高等人在山東嘉祥紫雲山下探得〈武斑碑〉、武梁祠堂畫像石室、〈武氏石闕〉、〈孔子見老子〉畫像石等

[82]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卷四十五，頁77-78。

[83] 黃易並未自識製作年月，然其最後一開描繪乾隆癸丑（1793）十月十九日五十壽辰時與好友共賞新得碑拓的情形，緊接於後的翁方綱跋紀年為甲寅（1794）正月廿四日，因此此冊的完成時間應在1793年10月下旬至1794年1月下旬間。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6	金鄉剔石室	不明	黃易命山東金鄉縣令馬于荃清除被河患淤泥覆蓋的東漢〈朱鮪畫像石室〉，剔出末幅有朱長舒等字，下另有八分隸字磨泐不清，黃易認為「似漢朱鮪等字」
7	良友贈碑	1783年夏 1785年5月	黃易先在1783年夏得王古愚贈〈魏元丕碑〉及〈盧江太守范式碑〉兩拓本，後於1785年五月又得張蔭堂贈〈成陽靈臺碑〉、〈幽州刺史朱龜碑〉及〈小黃門譙敏碑〉三種拓本，裝潢與前兩種拓本相同，黃易認為原皆屬同一收藏家所收
8	晉陽山題壁	1793年4月	濟寧晉陽山上的慈雲寺旁石壁間刻有碑形，但未勒字，黃易刻了四行八分書於其上
9	兩城山得碑	1792年4月	黃易於兩城山下得〈朱君長題字〉殘石，移置濟寧州學
10	嘉祥洪福院搨碑	不明	黃易在山東嘉祥洪福院佛座下一石搨得「成王」、「周公」、「魯公」等字，推斷為某東漢畫像石室之遺蹟
11	禱墓訪碑	1793年清明節	黃易攜子黃元長與何元錫（夢華，1766-1829）拜濟寧當地金石研究前輩潘恬庵之墓，祝禱訪碑有所獲，後黃、何兩人果然各有所得
12	小蓬萊閣賀碑	1793年 10月19日	黃易五十壽辰，遣工拓碑，在曲阜東門外得〈熹平二年半碑〉，於是邀請李東琪（鐵橋）喝酒共賞。同時並有許多好友同來賀壽

在此圖冊中，「得碑」指新獲碑石或古拓，亦指與訪碑、得碑相關的其他人際活動，其中第四、五、九開（圖13、14、15）[84]所描繪者與濟寧州學的漢碑相關。黃易以俯視的角度描繪得碑場景，將戟門週邊房舍、樹木，或是碑石遺蹟附近的山巒田舍皆包含於畫面中。廣角視角下的山村野水、輕霧瀰漫為訪碑過程的艱辛增添許多想像的空間。

[84]《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易的畫面富於敘事情節與準確細節，茲舉第四開「濟寧學宮升碑圖」（圖13）為例。此圖描繪1786年黃易受翁方綱所託升起〈鄭季宣碑〉的事件，一反其他畫幅以隸書書寫標題的作法，此畫幅左上角的七字標題「濟寧學宮升碑圖」是以篆書寫成的，黃易或許有意藉此影射〈鄭季宣碑〉上漫滅幾殆、令翁黃兩人百尋不著的篆額。畫面中央的高台式建築即州學戟門，上覆屋頂、四周設低護欄，內有石碑分列兩旁。圖16為此幅細部，可清楚看到升碑事件正在戟門內進行：數人面向左邊站立，其中兩人手拉繩索，繩索向上伸向屋頂（或許掛著類似轆轤的裝置）後往下穿過〈鄭季宣碑〉的額穿，碑旁另有兩人一前一後合力穩住碑身。

黃易畫中所圖〈鄭季宣碑〉的形像為圓首有穿，這與褚峻《金石經眼錄》中所記所圖完全符合（圖5）。除〈鄭季宣碑〉外，畫中戟門內尚有四碑，若結合文獻記載與《金石經眼錄》的摹圖，都能一一指認出來（圖16）：

（一）畫面左邊（戟門東側）：

〈鄭季宣碑〉所處的位置在戟門東側，其旁的兩碑為〈景君碑〉與〈魯峻碑〉。對照《金石經眼錄》中摹圖，緊鄰〈鄭季宣碑〉者圭首，碑穿位置較低，應是〈景君碑〉（圖1），再過來的圭首碑碑穿位置較高，應是〈魯峻碑〉（圖4）。

（二）畫面右邊（戟門西側）：

最右側高大的圭首碑應為〈武榮碑〉（圖5）。內側較為低矮者應為斷裂不全的〈鄭固碑〉（圖2）。

戟門內共有八位人物，旁邊的迴廊內另有兩位交談中的人物，他們可能指涉升碑過程中的特定參與者。目前所知助立〈鄭季宣碑〉者，除了黃易本人，尚有李東琪，並得濟寧直隸州事劉永詮、州判王所禮的幫助。[85] 其他的參與者

[85] 黃易〈鄭季宣碑〉碑側題字，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十六日。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並載於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頁464；《濟寧州金石志》，卷二，頁94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待進一步研究。

黃易的得碑圖與宋元或清初的〈讀碑圖〉（圖17、18）傳統大異其趣。[86]後者通常不指涉特定人事物，而著重利用筆墨技巧在畫面上經營懷古、傷逝的情調，前者則特別注重具體活動內容的呈現而少筆墨琢磨。若與黃易自己的其他山水畫比起來，他所繪得碑圖的技巧亦顯得較為簡單，更像是速寫。對黃易而言，這些圖繪的最大功用顯然在記錄事件，並以之作為擁有共同興趣與經驗的友人間的情誼表徵。這與前文提及翁方綱在詩文中藉著提點訪碑的點滴來為彼此友誼作注腳的情形是相同的。翁方綱為〈得碑十二圖冊〉作序，還為每一開圖賦一詩再寫一跋，他可能即是此圖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觀者。而在這詩圖往復的過程中，亦圈出了一個以訪碑為中心的親密交遊圈。[87]

六、訪碑活動影響下的漢隸研究

方聞（Wen C. Fong）教授曾提出中國書法史的四大變革（the four calligraphic revolutions），分別是四世紀的王羲之行草書、七世紀的初唐楷書、十一世紀的北宋士大夫尚意行草書，以及十四世紀的趙孟頫中、大楷書。[88] 而事實上，十八世紀碑學書法的興起可視為與前四項具同等重要性的第五變革。碑學書法講求學習石刻材料上留存的古代典範，在數百年的帖學傳統外另闢蹊徑，其以知識性的考古為根基，與訪碑活動及相關研究的發展有著相生相發的關係。此議題牽涉廣泛，非本文可以涵括，筆者在此僅對訪碑活動影響下，漢隸研究在形式與內容上的改變提出幾點觀察，盼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

[86] 關於早期〈讀碑圖〉，可參見Qianshen Bai, *Fu Shan's World*, pp. 179-182.

[87] 關於黃易的訪碑圖如何建構友人間的共同記憶，可參考曾藍瑩對〈嵩洛訪碑圖冊〉的討論。Lillian Lan-ying Tseng,"Retrieving the past, Inventing the Memorable: Huang Yi's Visit to the Song-Luo Monuments," pp. 37-58.

[88] Wen C. Fong,"Chinese Calligraphy: Theory and History," in Robert E. Harrist and Wen C. Fong eds., *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 (Princeton: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 37.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一）留心碑石所在地點

訪碑風氣興盛引起了金石學者們對碑石所在地點的留心，進一步反映在著錄編寫上，最重要的例子之一為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研究者一般僅注意此書首開斷代金石著錄的先例，卻少有人關注它的其他打破傳統的作法。此書出版於1789年，內收有近九十種漢碑。翁方綱不依編年的傳統，「所編錄或以地，或以事類，惟以所親見為據，不復能依年次矣。」[89] 其中最特別的即以石刻所在地點作為重要的編排原則之一。《兩漢金石記》各卷的內容安排如下：

卷 次	內 容	編排原則
一	年月表	年月表
二	目錄	目錄
三	石經	石經
四	古器物文上	青銅銘文
五	古器物文下	
六	〈禮器碑〉等六種	山東曲阜碑刻
七	〈故豫州從事孔君碑〉等七種	
八	〈魯峻碑〉等七種	山東濟寧碑刻
九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等五種	河南嵩山碑刻
十	〈西嶽華山廟碑〉等二種	陝西西安碑刻
十一	〈蒼頡廟碑〉等五種	陝西西安及江蘇、河北地方碑刻
十二	〈張遷碑〉等七種	陝西、山東省內其他地方碑刻
十三	〈西峽頌〉等七種	陝西地區摩崖
十四	〈殷比干墓字〉等十一種	四川、西北地方碑刻及山東畫像石
十五	武梁祠堂畫象〉等三種	山東嘉祥碑刻
十六	〈魏元丕碑〉等八種	重刻本、摹本與雙鉤本
十七	〈漢故沛相楊君之碑〉等五種	漢碑待考者
十八	〈魏孔羨碑〉等九種	三國時期碑刻
十九	〈隸續補〉一篇	論書文字
二十	〈隸八分考〉一篇	
二十一	〈范式碑〉等	補遺
二十二	〈班馬字類附記〉	

[89]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一，頁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卷三「石經」及卷四、五「古器物文」因類別特殊而置諸漢碑之前。卷十六以後為漢碑重刻本、待考者、三國時期碑刻、論書文字與補遺等。卷六至十五為最主要的內容，所收漢碑大致以所在地區分，再輔以類型（如摩崖、畫像石等）細分。碑刻地點方面，翁方綱首先參考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牛運震與褚峻的《金石圖》等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前期的訪碑成果，在每件碑的條目下注明所在地點，接著補充黃易等同時代人的新收穫。翁所見山東曲阜的十三種漢碑全收在卷六與卷七；濟寧州學的漢碑收錄於卷八；嘉祥武氏祠堂諸石則另收於卷十五。翁並在全書之首編列年月表，以平衡偏重碑石地點的編排方式。傳統金石著錄重編年的作法主要方便「以碑證史」的研究，翁方綱打破縱向的時間排序，轉而關注石刻所在地，明顯與其訪碑關懷有直接關連，而他綜合前代的訪碑成果與著述，似乎有集大成的意味。

雖自宋代即有分地記載的石刻著錄，如南宋王象之《輿地碑目》與陳思《寶刻叢編》等，然數量極少。十八世紀以後此類著作數量激增，據1930年容媛編輯的《金石書錄目》統計，有一百五十部以上，[90] 著名者如畢沅的《關中金石記》（1781）、《中州金石記》（1787），畢沅與阮元的《山左金石志》（1795）、阮元的《兩浙金石志》（1824）、武億的《安陽縣金石錄》、《偃師金石記》（1788），還有孫星衍與邢澍的《寰宇訪碑錄》（1802）等。此外，十八世紀以後，地方志中的金石志目數量尤多。此類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亦扮演了導覽的角色，加強眾人訪碑的興趣。

（二）重視碑文布排

翁方綱在《兩漢金石記》中利用各時期的著錄、拓片與原石現況作仔細的交叉比對。為了方便比對，翁在書中設法重現原碑上的行列布排。例如前文所引〈鄭季宣碑〉的例子，翁方綱將新獲隸字依行次安排，並註明缺字數目與位置（圖10）。此作法在比較字數與釐清碑陰捐款人名列上尤其顯得方便。與前代著錄僅抄錄碑文，或使用剪裱本校碑而不顧行列布排的作法相比，翁方綱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⑨⓪ 容媛輯、容庚校，《金石書錄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

校刊作得更為徹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樸學的治學態度。

（三）力矯字書中漢隸字形失真的情況

翁、黃兩人皆十分關注如何複製重現漢隸字形的原貌。所謂「原貌」指的是形像與尺寸兩方面，黃易在《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採用雙鉤描摹的方法，原寸原樣呈現拓本中的漢隸字形。翁方綱在其詩文題跋中則經常提到字體大小的問題，例如他曾不止一次強調，武氏祠畫像石的榜題是所有漢隸中尺寸最小的。在作於約1810年的一首詩中，翁方綱回顧他三十年來與拓片為伍的經驗：

我齋軸漢隸，十丈充蓬蒿。
小几憑作梯，下上若狖猱。
廓填借窗光，終日寧憚勞。
忽復三十秋，尾波記釐毫。
每欲量筆勢，大小各分曹。
武梁祠畫榜，豈例蜀與褒。漢隸大至三四寸外無若蜀王稚子闕及褒斜鄐君刻，而莫細於武梁祠字。[91]

翁方綱此詩出自〈書隸韻後五首〉，是針對當時碑學家常用的字書（如南宋劉球《隸韻》、婁機《漢隸字源》等）刊刻本中，隸字嚴重失真所發出的批評。此類字書由各漢碑擷取字例，再依音韻編排，功能如同現今的書法字典，對經學家稽古及書家習字頗有助益。然由於反覆摹刻，其中的隸字到了十八世紀已嚴重走樣失真，規矩排列如算子（圖19）。[92] 翁方綱曾為秦復恩於1815年重刻的劉球《隸韻》作長篇考證，不厭其煩地一一指出其中的失真隸字。翁的考證作得極細，從撇畫的彎弧角度、點的位置，乃至開口方圓俱無遺漏，成為極詳盡的「勘誤表」，[93] 茲舉武氏祠榜題中的「祇」字為例說明。

[91] 翁方綱，〈書隸韻後五首〉，《復初齋詩集》，卷六十三，頁264。
[92]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
[93] 翁方綱，〈隸韻攷證〉，二卷，《隸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37-2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所示是秦復恩版《隸韻》中的「祇」字（第五行最後一字）。[94] 翁方綱在其考證中評道：

> 武梁祠像碑“祇”右邊中橫之末上有小點，而其末筆不如此放長波。此書內凡遇此碑，字多失在放尖太過。此碑本漢隸之極細者，故不甚有出波之地。[95]

除了《隸韻》，翁方綱亦多次批評婁機《漢隸字原》與顧藹吉《隸辨》等同類型著作。 翁方綱倚靠他對碑石與拓本的熟悉而以漢隸權威自訂，這樣的條件僅在訪碑盛行、佳拓數量豐沛的情況下才能產生。

黃易與翁方綱的訪碑活動與研究對十九世紀的碑學影響深遠，這在後續學者編纂的字書中可以清楚看到。道光年間金石學家翟雲升於1838年出版《隸篇》，其中不僅收入新出土材料，同時改正了幾乎所有翁方綱對過去字書所提出的批評。圖21所示是《隸篇》中的武梁祠「祇」字（左頁第二行第二字）。[96] 此字尺寸比起前後左右，取自其他碑的「祇」字明顯小了很多，符合武梁祠畫像榜書字體實際尺寸較他碑小的情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翟雲升使用雙鉤法描摹出了「祇」字右邊中橫之末上的小點，同時右邊末筆不出波，反而向上彎折。此「祇」字出自武梁祠西壁上第二層的曾子與其母幅之題榜（第三行最後一字）（圖22）。[97] 若將武梁祠畫像拓片、《隸韻》、《隸篇》中的三「祇」字相較，可明顯看出《隸篇》者較接近原刻形貌。

這種重視原刻隸字樣貌與風格的作法，對漢隸書法典範的傳播與學習有著重大影響。乾嘉以後由於石刻出土多，據以修訂增輯的古字體字典，除翟雲升《隸篇》外還有數種，如項懷述《隸法彙纂》、邢澍《金石文字辨異》，以至趙之謙的《六朝別字記》、羅振鋆的《碑別字》等。近人朱劍心直指這類著作的要旨「實不過為臨池之一助，使下筆有本耳。」完全是為了書法學習而作。

---

[94] 劉球，《隸韻》，頁21。

[95] 劉球，《隸韻》，頁239。

[96] 翟雲升，《隸篇》（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1。

[97] Cary Liu et al,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p.1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㊽ 它們一方面因應眾書家對篆隸等古字體的學習興趣而生，另一方面亦增進了古字體的普及運用，使更多書家投入其中。十八世紀以後的篆、隸書法創作，即深植於這種對古字體與書法風格的知識性探索，並在鉅細靡遺的考證中建立起異於帖學傳統的新典範。

結論

本文考察濟寧州學所藏漢碑在超過一世紀（十七至十八世紀後期）的時間中，被清理取拓、升起重立或發現移入的歷史，尤其聚焦十八世紀後期黃易與翁方綱等人在此地的活動，以及他們對相關活動所作的各種再現、詮釋與演繹，最後討論訪碑活動如何造成漢隸研究的改變，且影響及碑學書法的盛行。

十八世紀的訪碑雖承繼十七世紀而來，然在運作模式與論述上都有深刻的質變。此時由地方人士（李東琪）、當地學者官員（黃易）與外地金石同好（翁方綱）所組成的人際網絡，共同形塑訪碑的進行與論述，取代了過去多由零星個人單獨行動的情形。而他們針對訪碑所作的文與圖涵蓋人、事、物的客觀記述及再現，還有主觀情感的投射與演繹，訪碑活動已成為這個親密交遊圈中，具備清楚目標與進行方法的共同關懷。事實上，對訪碑的關懷構成了十八世紀後期一項普遍的文化論述，不但強調透過親訪、親視來具體掌握文化史蹟（尤其是石刻）的內涵與意義，進一步更期望從中建立新的藝術典範。

翁方綱在1790年所作「秋盦署齋觀所藏金石，秋盦為作圖，同賦三首」的最後一首詩末寫道：「半晌茶煙千載事，漢碑圖畫出文章」，這正可用來描述十八世紀後期的訪碑，及其衍生出的文化論述。濟寧州學漢碑的發現與重立，為此時期的訪碑活動及相關問題，提供了一重要的切入視角。

（責任編輯：黃琪惠）

㊽ 朱劍心，《金石學》，頁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江藩

《漢學師承記》，收入《清代傳記叢刊》，001，臺北：明文書局，1985。

李放

《皇清書史》，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九十九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胡德琳等修，盛百二等纂

《濟寧直隸州志》，乾隆四十三年（1778）刊本。

徐宗幹纂

《濟寧直隸州志》，道光二十一年（1841）完成，咸豐九年（1859）刊行，收入《新修方志叢刊》，第83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

徐宗幹輯

《濟寧州金石志》，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十三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翁方綱

《復初齋集外詩》，收入劉承幹編，《嘉業堂叢書》，浙江吳興：嘉業堂，1918。

《兩漢金石記》，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

《復初齋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復初齋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張朝端編

《張力臣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8。

梁章鉅

《浪跡叢談》，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第33號，北京：中華書局，1981。

黃易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

《秋盦遺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

《金石經眼錄》，收入《四庫全書珍本十集》，史部，第109冊，臺北：臺灣商務，出版年不詳。

褚峻摹、牛運震說

《金石圖不分卷》，據乾隆十年（1845）精刻拓印本影印，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78冊，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翟雲升

《隸篇》，北京：中華書局，1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明誠撰、金文明校證
《金石錄校證》，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
劉球
《隸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
顧藹吉
《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

近人論著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
1986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一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8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六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4 《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朱劍心
1964 《金石學》，香港：商務印書館。
余英時
1996 《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東大圖書。
何平
1999 《中國碑林紀行》，東京：二玄社。
何傳馨
1990 〈清初隸書名家鄭簠〉，《故宮文物月刊》，92期，頁130-137。
巫仁恕
2005 〈清代士大夫的旅遊活動與論述 —以江南為討論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頁271-275。
沈津
2002 《翁方綱年譜》，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容媛
1992 《金石書錄目》，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宮興衍
1990 《濟寧全漢碑》，濟南：齊魯書社。
梅原末治等編、戴蘭村譯
1989 《書道全集》第二卷，臺北：大陸書店。
梅原末治等編、于還素譯
1989 《書道全集》第三卷，臺北：大陸書店。
陳祖武、朱彤窗
2005 《乾嘉學派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淑蘭
1996 〈清黃易得碑圖冊〉,《收藏家》, 1996年3期（總第17期）, 頁15-17。
郭壽齡
1993 〈清初考古金石家張弨〉,《淮安古今人物（第一集）》(《江蘇文史資料》第72輯，《淮安文史資料》第11輯）, 頁194-197。
路遠
1998 《西安碑林史》, 西安：西安出版社。
楊殿珣
1979 《石刻題跋索引》, 收入《石刻史料新編》, 第三十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傅惜華編
1950-1《漢代畫像全集二編》, 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
葛榮晉、魏長寶
2000 《一代儒宗顧亭林》, 臺北：文津。
劉恆
1999 《中國書法史：清代卷》, 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蔡鴻茹
1996 〈黃易《得碑十二圖》〉,《文物》, 1996年 3期，頁72-79。
薛龍春
2007 《鄭簠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西林昭一
1996 《翁方綱の書學—「蘇齋筆記」譯註》, 京都：柳原書店。
Bai, Qianshen
2003 *Fu Shan's Worl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Elman, Benjamin A.
2001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econd, Revised, Edi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edderose, Lothar
2001 "Aesthetic Appropriation of Ancient Calligraphy in Modern China," in Maxwell K. Hearn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inese Art: Modern Expression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p. 212-245.
Liu, Cary et al.
2004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i, Yun-chiu

2008 “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Tseng, Lillian Lan-ying

2003 “Retrieving the Past, Inventing the Memorable: Huang Yi’s Visit to the Song-Luo Monuments,” in Robert S. Nelson and Margaret Olin eds., *Monuments and Memory, Made and Unmad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37-58.

Wu, Hung

1989 *The Wu 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P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北海相景君碑〉碑陽（右）與碑陰（左）。出自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金石圖不分卷》（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755。

圖2 〈郎中鄭固碑〉。出自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金石圖不分卷》（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758。

圖3 〈執金吾丞武榮碑〉碑陽。出自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金石圖不分卷》（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773。

圖4 〈司隸校尉魯峻碑〉碑陽（右）與碑陰（左）。出自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金石圖不分卷》（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766。

圖5 〈尉氏令鄭季宣碑〉碑陽（右）與碑陰（左）。出自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金石圖不分卷》（臺南縣：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頁773。

圖6 〈郎中鄭固碑〉。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Copyrigh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圖7 李東琪題刻〈廬江太守范式碑〉碑陽。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Copyrigh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圖8 黃易題刻〈廬江太守范式碑〉碑陰。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Copyrigh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圖9 〈朱君長題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Copyrigh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圖10 翁方綱補全今石所見〈鄭季宣碑〉。出自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八（臺北：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頁458-459。

圖11 翁方綱等題刻〈鄭季宣碑〉碑側，I。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Copyrigh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圖12 翁方綱等題刻〈鄭季宣碑〉碑側，II。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Copyright© Fu Ssu-Nien Library,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圖13 黃易，〈濟寧學宮升碑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15。

圖14 黃易，〈紫雲山探碑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16。

圖15 黃易，〈兩城山得碑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16。

圖16 黃易，〈濟寧學宮升碑圖〉細部，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頁215。

圖17 傳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大阪市立美術館。出自《藝苑掇英》，第四十八期（1994年4月），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張風，〈讀碑圖〉，紀年1659，蘇州博物館藏。出自《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六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64。

圖19　顧藹吉，《隸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

圖20　「祇」字。出自劉球，《隸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1。

圖21　「祇」字。出自翟雲升，《隸篇》（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1。

圖22　「祇」字。武梁祠畫像石拓片，出自Cary Liu et al.,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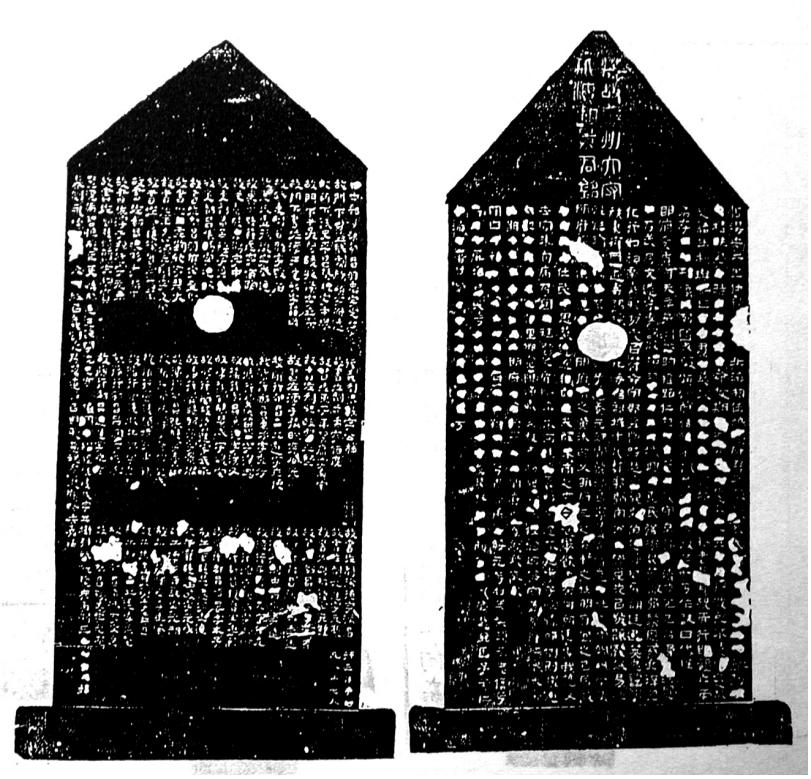


圖1　〈北海相景君碑〉碑陽（右）與碑陰（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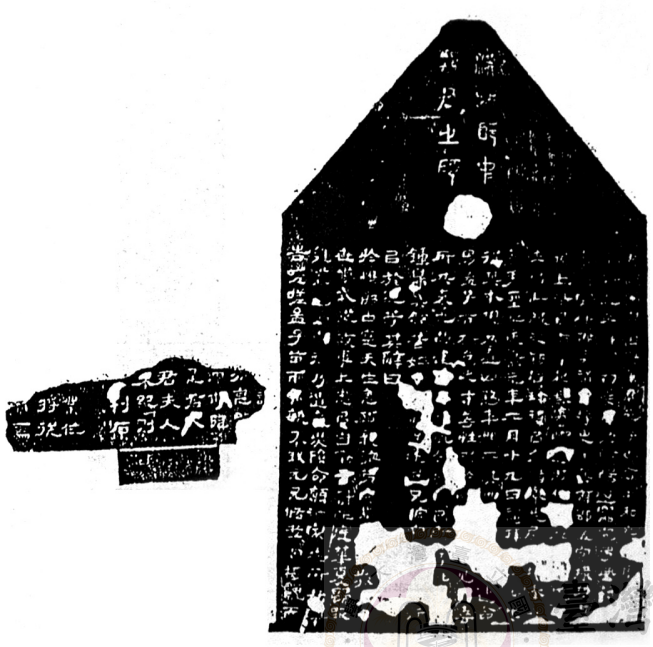


圖2　〈郎中鄭固碑〉

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3 〈執金吾丞武榮碑〉碑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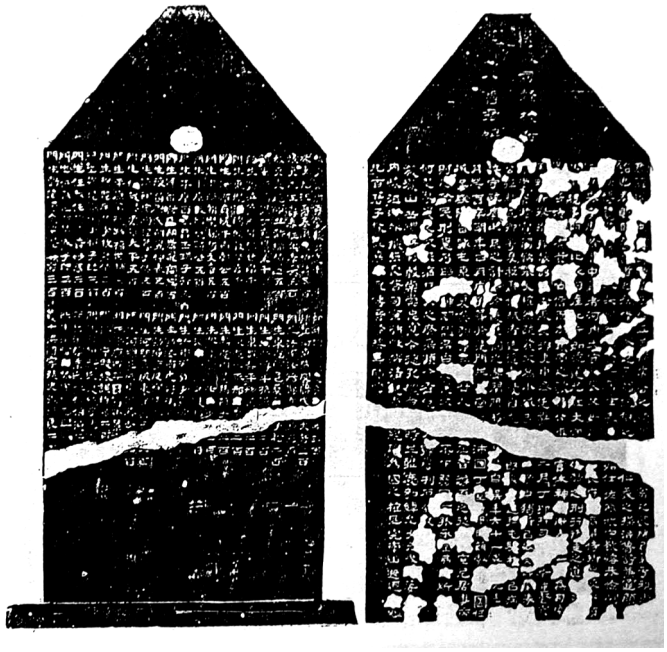


圖4 〈司隸校尉魯峻碑〉碑陽（右）與碑陰（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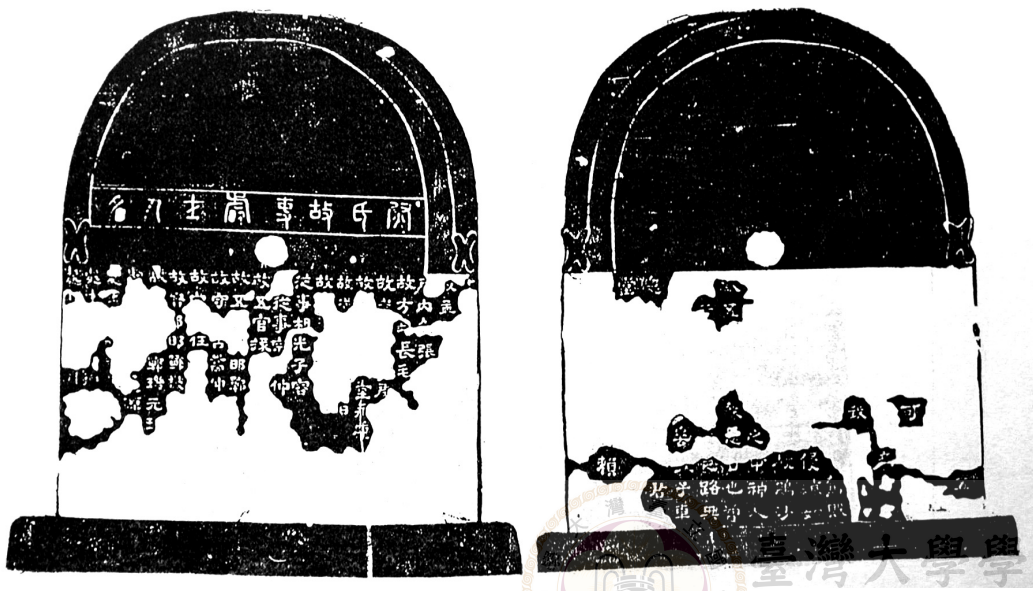


圖5 〈尉氏令鄭季宣碑〉碑陽（右）與碑陰（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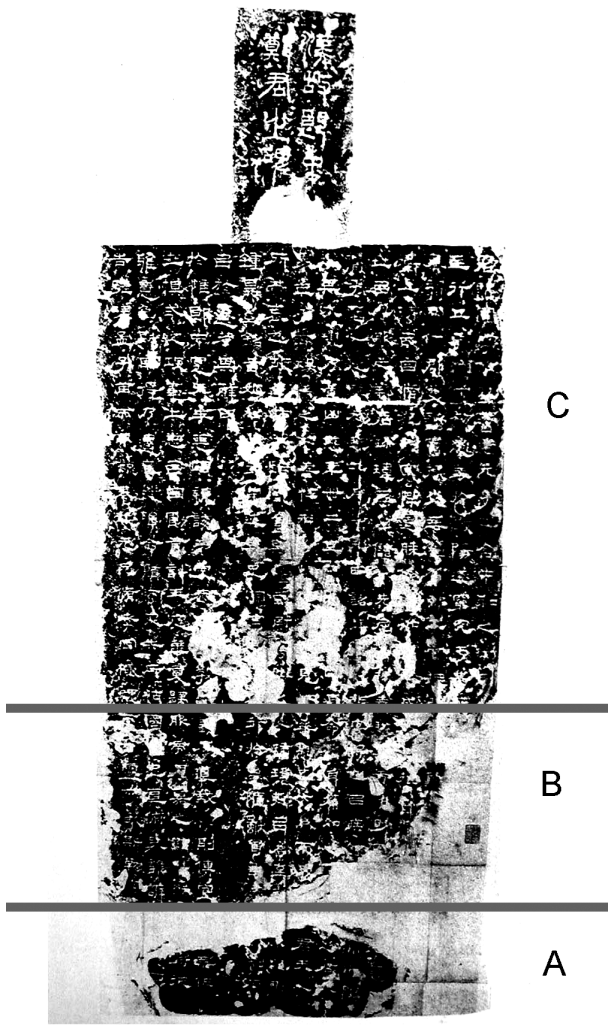


圖6　〈郎中鄭固碑〉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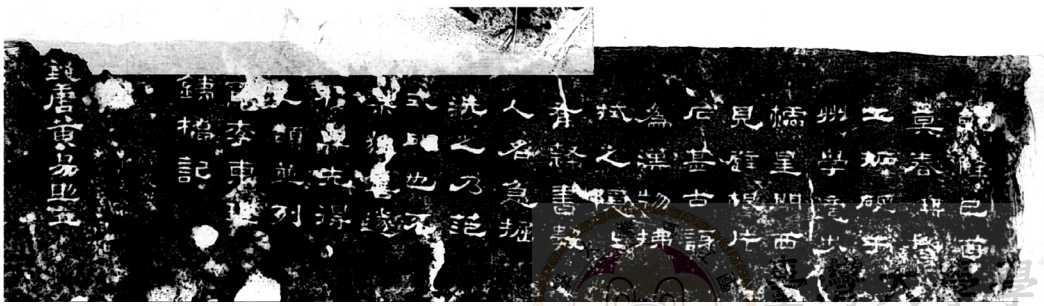


圖7　李東琪題刻〈盧江太守范式碑〉碑陽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8 黃易題刻〈盧江太守范式碑〉碑陰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圖9 〈朱君長題字〉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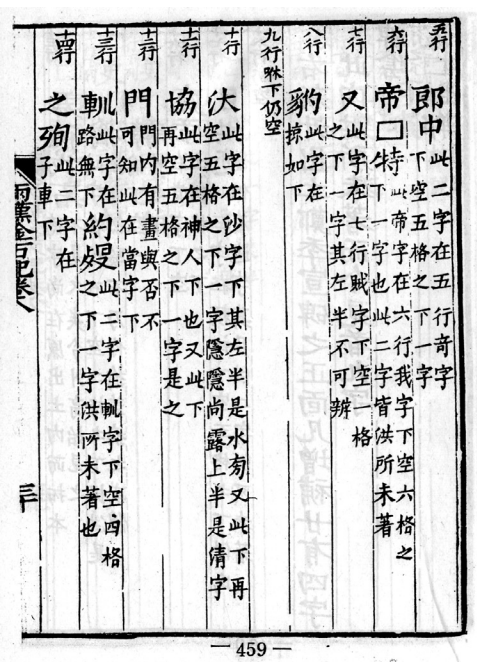


圖10 翁方綱補全今石所見〈鄭季宣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1　翁方綱等題刻〈鄭季宣碑〉碑側 I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圖12　翁方綱等題刻〈鄭季宣碑〉碑側 II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3 黃易〈濟寧學宮升碑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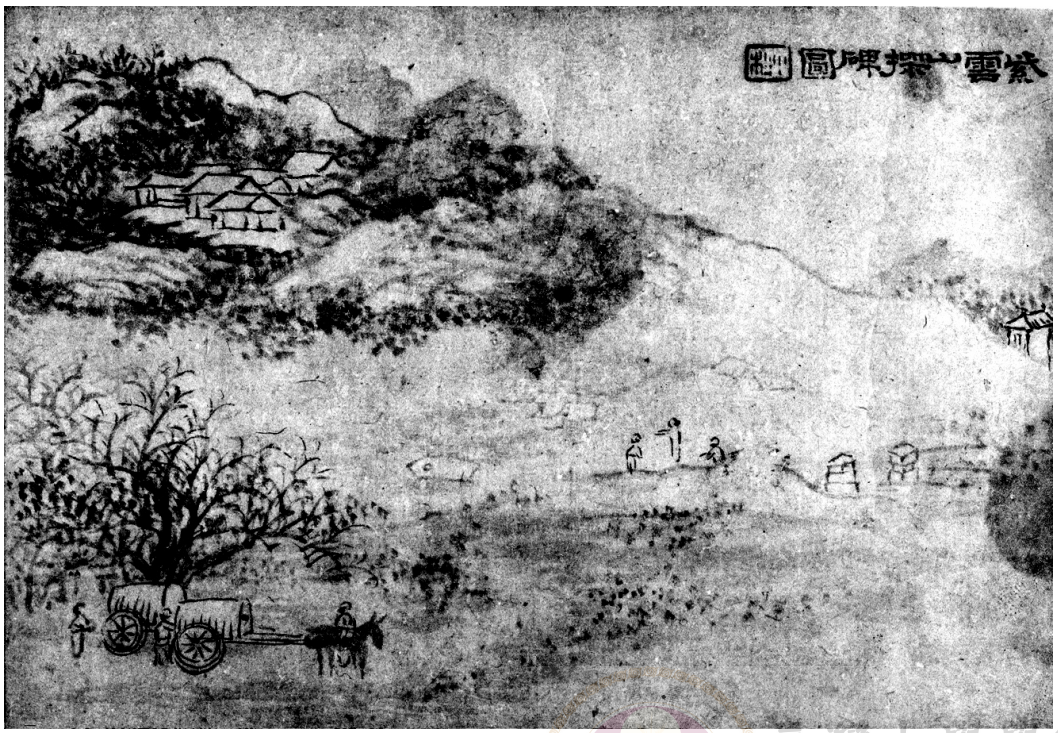


圖14 黃易〈紫雲山探碑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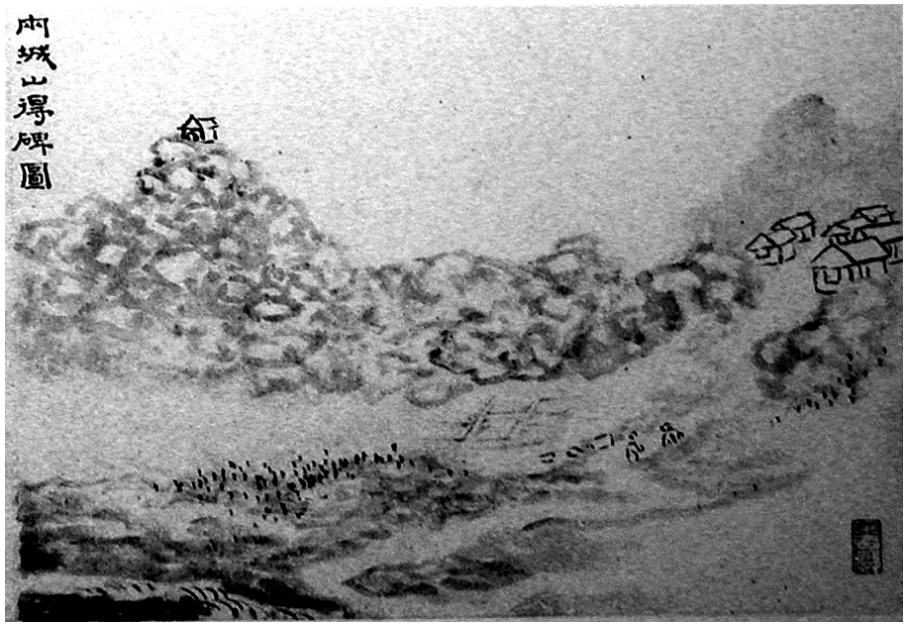


圖15　黃易〈兩城山得碑圖〉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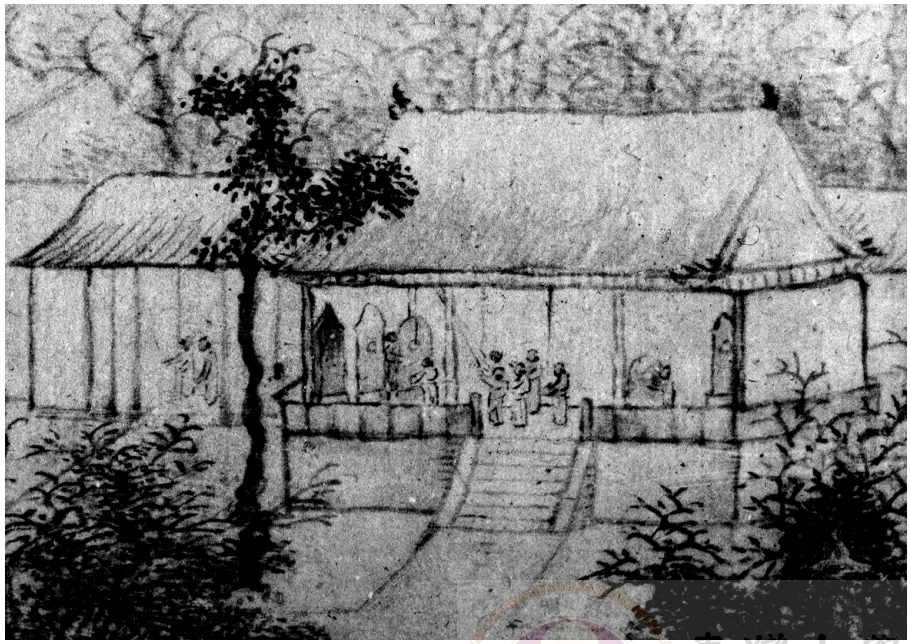


圖16　黃易　〈濟寧學宮升碑圖〉細部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7　傳李成、王曉〈讀碑窠石圖〉大阪市立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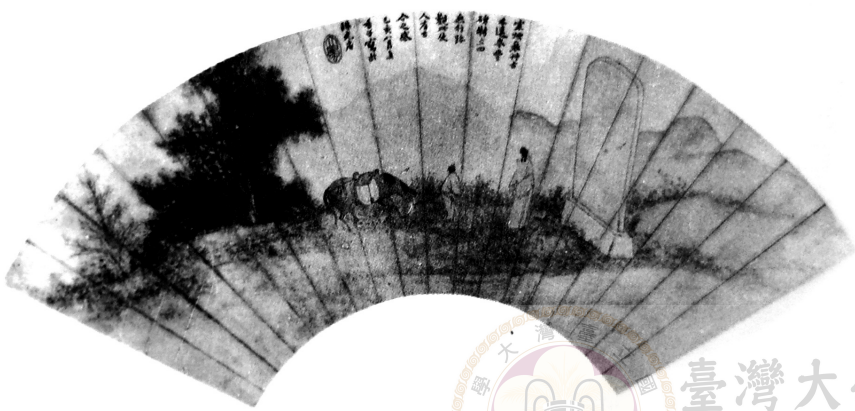


圖18　張風〈讀碑圖〉蘇州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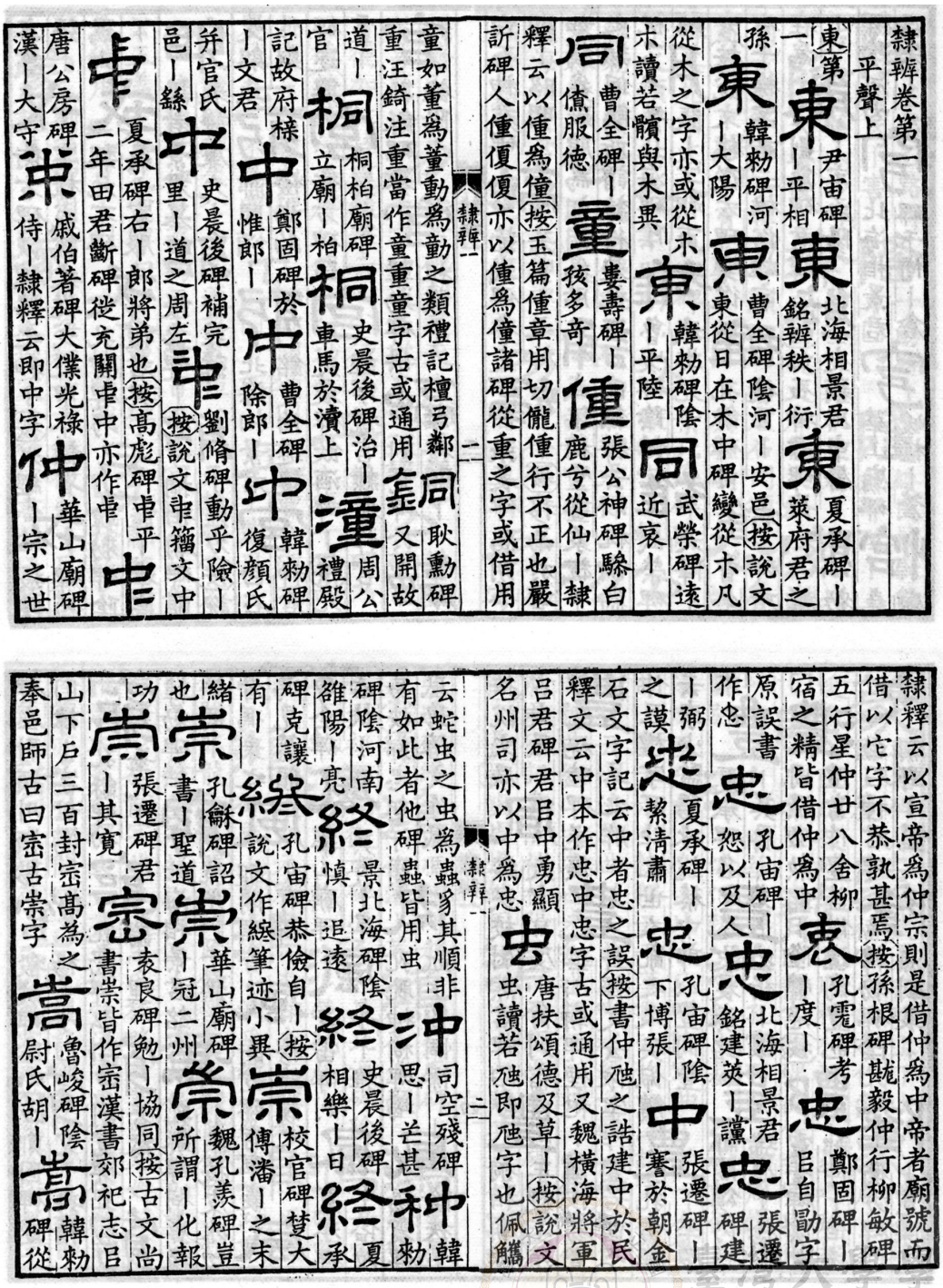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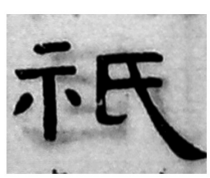


圖19　顧藹吉《隸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祇」字 出自劉球 《隸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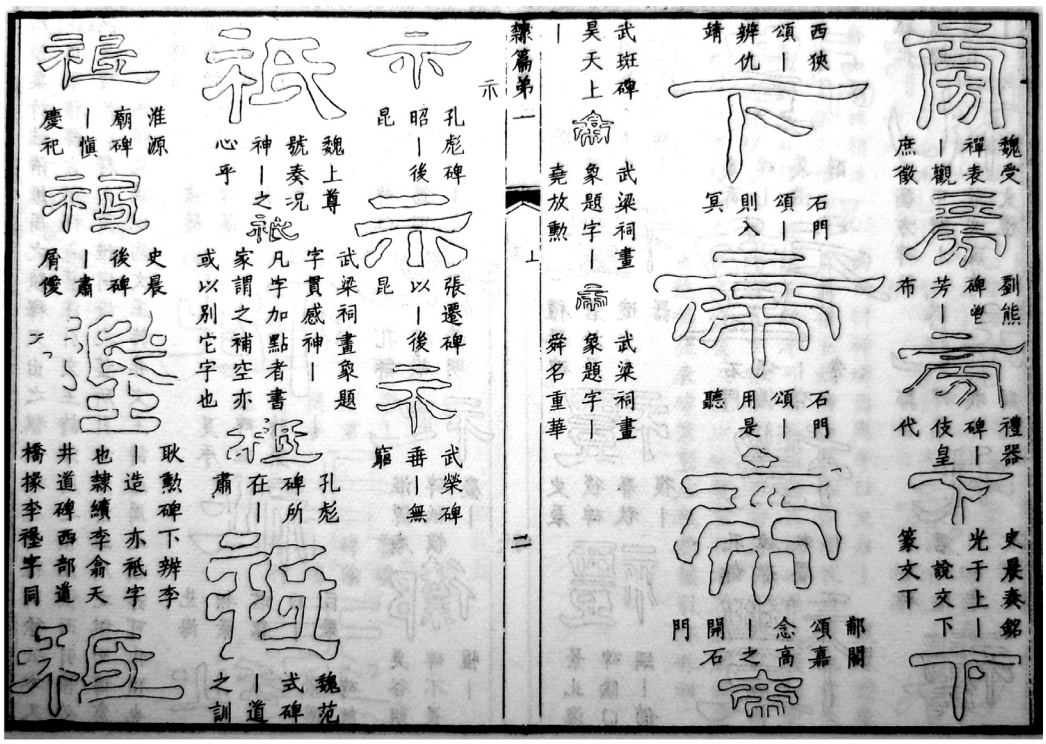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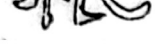


圖21 「祇」字 出自翟雲升 《隸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2 「祇」字 武梁祠畫像石拓片 出自Cary Liu et al., *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 "Wu Family Shrin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